燎原报

2020年6月刊 总第5刊

社会主义中国的覆灭

当代中国阶级现状

林夕的娃娃间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永远擎起

燎原

2020 年 6 月刊 总第 5 刊

【发布时间】2020 年 6 月 1 日

【订阅邮箱】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

【网站地址】muhua-usnnrqffjcqv.github.io

【Telegram】t.me/rcpcnews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关于本报

首先，要向本报的读者们，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宣传的同志们和与剥削压迫作斗争的的工人同志们，表示由衷的致敬。

本报诞生于全球共运火焰愈演愈烈的大环境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的环境下。在这种大环境下，无产阶级的组织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如缺乏组织性、成员、防范经验等问题。这些问题是急需解决的，并且是要结合目前实际情况来解决的。为了使遇到的问题更好的解决，本着为无产阶级奉献一份力量的精神，我们创办了本报。

目前，本报的主要方向是刊登一些关于组织建设、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防范方法和对当前现状的分析等。本报的次要方向是刊登一些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文章。总之，主旨就是刊登一些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的文章和一些斗争的经验方法的文章。

关于投稿：

由于本报刚刚起步，编辑部成员，投稿人数可能比较少，知识水平也可能不是很高，导致文章的质量和更新的速度不一定高，因此，我们欢迎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加入本报编辑部，另外，如果有所作的作品也可以进行投稿，如需加入或投稿请联系编辑部邮箱（下面）。

联系方式：

邮箱：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
网站：muhua-usnnrqffjcqv.github.io
TG 频道：t.me/rcpcnews

关于转载：

在未经专门注明的情况下，本刊上的文字内容依据“CC BY-SA 4.0”许可证（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进行授权。要查看该许可证，可访问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关于订阅：

本报欢迎任何人或组织前来订阅。如需订阅请向编辑部邮箱（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发一份题目为订阅的邮件（推荐使用微软(Outlook)/谷歌(Gmail)/Protonmail 之类邮箱而非 163/QQ 邮箱订阅）。您的邮箱将会进行保密。如果您没有邮箱，但是有 telegram 账号也可以订阅 tg 频道（rcpcnews）。另外，如果都没有的话也可以浏览网站（muhua-usnnrqffjcqv.github.io）。

此外，本报欢迎您进行任何形式的二次传播。如需往期刊物，也可联系编辑部邮箱。

《燎原》编辑部
2020 年 5 月 18 日

目录（点击标题可跳转）：

1. 社会主义中国的覆灭 6
2.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永远擎起 44
3. 改开真提高了经济？ 45
4. 林夕的娃娃间 47
5. 当代中国阶级现状 50
6.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权利的讨论 60
7. 对版权的一些探讨 62
8. 建国三十年经济数据 65
9. 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吗？ 67
10. 请看苏修的新玩意 72

社会主义中国的覆灭

地火阵线

笔者原先的标题，是《反驳“先富论”》，这是因为笔者本只打算从经济这一个方面出发，来批驳一番我们的总设计师。后来发现，还是把社会的方方面面整合起来比较容易论述。所谓“先富论”，同志们早就耳熟能详了。笔者这里所指的“先富论”，并不单指那句吹大法螺的“先富带动后富”，也是指邓小平及其修正主义同僚和继承者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尽管“先富论”在根本上就违背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但笔者水平有限，在辩驳这个论断时难免出现疏漏和错误，希望同志们批判地阅读，非常欢迎同志们指正。

文化大革命以后，邓小平和他的拥趸们开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反思”。邓小平认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毛泽东“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总设计师巧舌如簧，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思路：“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随后，他又多次强调：“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总设计师的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被后人整理成一句大大的标语——“先富带动后富”。这句话就像一条鞭子，甚至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后所谓的经济爆发式增长的狂奔之路上，这条鞭子虽然把广大劳动群众抽得生疼，但他们无怨无悔，什么黑猫白猫，什么功过三七，大多数人不会在意这些似乎远在天际的问题，人民努力建设祖国，甘愿被剥削，因为那位和蔼的领导人承诺的——先富起来的慈悲的资产阶级将会带领他们共同富裕。人民可怜巴巴地等待着，一直等到了今天。

笔者不仅要问，如果先富能带动后富，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早就消灭贫富差距了吗？不仅如此，所有人剥削人的制度统治的社会，所有有着巨富和赤贫的分化的社会，最终都会消除贫困和不公，走向和平。

难道在封建社会，地主能带动雇农富裕吗？

请注意，设计师说的“先富带动后富”后面，还带了一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甚至还强调“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总设计师显然认为，地主不但能带动雇农富裕，而且雇农最终掌握的社会财富还将能与地主所匹敌，不仅如此，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还要拱手相让政治地位，不然怎么“无产阶级专政”呢？也就是说，最终地主还要为雇农服务，皇帝都要给雇农们下跪。丰功伟绩！总设计师如果生得再早一点，早早继承家业，成为四川一位大地主的话，他估计已经在土地改革期间被吊死了。

在讨论“先富论”的成败之前，我们不禁要先质疑一下其施行政策的正义性。所谓“正义性”，其实是个伪命题，我们暂且把杀人放火、作奸犯科视作不义，反之则是正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先富起来”的那群人，都是什么人呢？倘若是广大无产阶级弟兄通过努力劳动，实现阶级跃升，那也罢了，毕竟地域差距今日仍在，沿海和发达地区显然比内陆地区机会更多，这样的客观上的不平等无法完全消除。但改革开放以后，最先富起来的，却是邓小平和其拥趸们的后代——那群所谓的“红二代”。那些在文革初期成立“西纠”“联动”，鼓吹“血统论”，大搞武斗，打死打伤制造冤案无数的红二代们，在 1984 年竟被平反，摇身一变成为了第一批富裕起来的人——好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好一个“拨乱反正”！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总设计师的女儿邓榕，她是西纠联动的重要骨干。官方的资料记载，西纠发起武斗后，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到九月初，有 1772 名北京市居民被杀，其中多是被残酷折磨致死。而邓榕的副校长卞仲耘，便是被邓榕“斗争”致死的。

8 月 25 日，“西纠”成立，26 日，北京市被打死人数就从二位数升至三位数！“西纠”成立后展开活动的几天，也就是北京市被虐杀人数最多的几天！而在这一非常时期里，在北京市被虐杀总人数中，数“西纠”主要活动的西城区死亡人数最多，为 333 人，比第二、三、四名的总和还多。

作为文革时期大肆鼓吹武斗和血统论，背负着累累血债的邓榕，被“平反”之后却成为了伤痕文学的一代“大师”，她将自己父亲“在文革期间受到的不公待遇”撰写成书，大肆控诉文革的苦难。反动派的无耻还真是没有下限，笔者摘取其中一部门，博大家一乐。

十年“文革”早已结束了。这场 20 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政治大劫难，早已化为一个遥远的记忆，沉淀在了人们的回忆里。不过，虽然“文革”结束已有二十多年，但是，每一个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岁月渐渐流逝，光阴一去不复返，但那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情感的烙印，却永远不会消失。……十年“文革”，是发展到极端的错误的爆发性的大宣泄，是一个跌宕起伏而又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客观发展阶段。“文革”所留下来的，不只是沉痛和创伤，更有可以思考可以以兹为戒为鉴的重要历史教训。虽然在“文革”十年中，国家之损失、党之损失、人民之损失巨大而惨痛，

但是，它的谬误给人们留下的教训和警示，却是极其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对毛泽东——这个在晚年犯了重大错误的历史伟人——做出一个负责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后记

好一个楚楚可怜的样子！“大劫难”“刻骨铭心”“铭刻”“烙印”“极端的错误”“大宣泄”“跌宕起伏”“极其复杂”“沉痛的创伤”“惨痛”“谬误”，您在文革期间可真是遭遇了十分不平等的待遇！贼喊抓贼莫过于如此了。

笔者也十分钦佩当代为这些杀人犯粉饰的御用文人们，对于总设计师的女儿，再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也要写成伟绩——“文革肇始，（邓榕）积极参与“红卫兵”斗争，参与了 1966 年 8 月 5 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批斗时任该校副校长的卞仲耘致死一案。”听听！“积极参与”斗争，“参与”了杀人——你们的春秋笔法还真是高超！

第二个典型的例子便是孔丹，孔丹的父亲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孔原在抗日时期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西北工委委员、西南工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和组织部部长，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建国后曾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署长、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国务院外办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还曾在 1988 年 7 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可谓是——至少是表面上看，孔原都是一位对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革命。

与邓榕一样，孔丹也是“西纠”的主要成员之一。相比于后来成为作家养尊处优的邓榕，孔丹显然更有“志向”。与大多数红二代一样，孔丹在上山下乡完毕，回到城市之后立刻使用特权进入大学学习。1981 年，已经 34 岁的孔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此后，他进入了多家著名的买办公司从任要职，并迅速高升。

虽然曾师从经济学家吴敬琏，孔丹却似乎没有学到什么真才实学。1983 年，孔丹加入光大集团，负责沿海城市业务部，1993 年，担任光大集团副总。仅仅过了两年，光大信托投资公司就爆发了那场著名的巨额亏空事件。第二年，孔丹就离开了光大信托，成为集团副总经理，后任总经理。

在之后，孔丹的高升之路反而更加顺畅，离开光大之后，他进入了另一个著名的买办集团——中信。2002 年 11 月至 2006 年 10 月，孔丹担任中信嘉华董事长。同时担任中信集团、中信国金、中信（香港）集团、中信深圳（集团）公司、中信裕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及中信嘉华非执行董事。

相比于低调的邓榕和其他红二代，孔原显然放浪很多。2013 年初夏，在一场同学会上，秦晓质问孔丹：“百姓的呼声你们就听不见，你有没有信仰啊？你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你信仰啥？”孔丹恼羞成怒：“我肏你妈！”

笔者忍不住赞叹，多么标致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七条，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道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三十八条，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当然，我们的红色贵族怎么能受到法律的制约呢？笔者在这里贴出一段党纪，也只是搏大家一笑罢了。

改革开放之后成立的一系列买办公司，施行的所谓“双轨制”所造成的恶劣后果，笔者在这里不再赘述。

倘若说，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急需大量人才，红二代毕竟多生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从小接受高水平的教育，的确比一般人更有优势，迅速占据社会上——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方方面面的有利位置，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们家族背景深厚，在那个社会背景下，他们大多也的确比一般人更有能力。

但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新一代的，从底层竭力打拼而爬上社会中上层的真正有能力的人已经遍地都是，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这个社会究竟属于谁呢？

笔者在这里列举一些罢。

我党和我国的最高领导人（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是如习近平（习仲勋之子）；

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俞启威之子）；

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姚依林之女婿）；

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曾山之子）；

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薄一波之子）；

原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叶剑英之子），原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邓朴方（邓小平之子）；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陈云之子），现任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李鹏之子）；

原任中共内蒙古区委副书记暨自治区政府主席布赫（乌兰夫之子）；

原任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王震之子）[4]等。

笔者在这里还要插一句，火炬党似乎觉得，习近平“同志”是一位从基层奋斗而上的、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反腐手段高超的、爱民如子的、嫉恶如仇的真正的铁腕左派。甚至希望这位先生能带领我们扫除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社会积毒。尤其不切实际的是，他们竟然觉得习近平能在任期之内把体制内的走资派和红二代扫除干净。看来这群保皇党真是没有记性，记不得当年薄熙来的教训——当年他们如何推崇薄熙来，现在就如何推崇习近平。让习近平扫除红二代和特权阶级，难道要让他扫自己吗？让皇帝来革自己的命？好一个“革命乐观主义”！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打倒资本家？因为他们骑在人民头上，榨取社会财富；我们为什么要与资本主义制度斗争？因为它制造不劳而获，导致社会不公。倘若我们打倒了资本家，请来了官僚来统治，那和封建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国烂了，人民就推翻它；党烂了，人民就打倒它，这是毛主席说的——他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罢了，不是什么皇帝，没有什么是值得人民效忠为其的。

说回我们的主题罢。

总设计师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听吧！"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真是说胡话！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就是"多劳多得"，如果"先富起来"的人们是因为"辛勤努力成绩大"而勤劳致富，那么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才是其成功最好的方式，总设计师又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化和私有化呢？制造出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又有什么用呢？资产阶级莫非是"勤劳致富"的不成？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早就告诉了我们，资本家是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他们靠剥削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而活，是吸血鬼和寄生虫。发展私企，难道就能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吗？譬如制造一批合法的小偷，还要大肆赞扬小偷的"辛勤努力成绩大"，告诉人们小偷"勤劳致富"的秘诀，要"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能带动社会进步吗？

在思想上，总设计师和他的同僚们做的更加无耻——他们似乎把去马列毛的修正主义行径描绘成了一场巨大的胜利——打倒"两个凡是"，看起来是打倒了华国锋，实际上则是打倒了毛主义。他们尤其擅长的，就是把 1979 年描绘成"思想解放"的一年，好像在这之前，中共对文化有着严密控制，中国的思想文化僵化了一样——好一个倒打一耙！笔者翻阅了历年的人民日报，自 1979 年以来，这冠着"人民"二字的二流报纸上的文章还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多为批判变成了全部都是歌颂——歌颂我们伟大的二共！这一点，我们的同志们都有目共睹，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十七大之后，我们在思想上的自由反而在逐步僵化。

1979 年之前的人民拥有什么自由呢？除了宪法规定的言论、结社、游行等如今已经名存实亡的自由之外，还有贯彻到底的四大自由——即是指 1949 年到 1978 年的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 1966 年到 1977 年文革期间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种公民权利，此"四大自由"曾经被写入 197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趣的是，这四大自由，在改革开放之后——即所谓的"思想解放"之后，竟被偷偷移出了宪法。

在上面，笔者大体论述了改革开放之后，由“先富论”所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问题。有的同志可能觉得疑惑，因为把这一切都归结于一项经济政策，似乎难免有些不妥。恰恰相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依靠先富论诞生的新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只要掌握了足够多的社会财富，便一定会控制政治和文化。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且政治和文化的改变为经济的改变打下了基础，经济的改变又反作用于政治和文化，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笔者不再赘述，接下来，笔者将具体分析上述三各方面如何失败。

一、经济

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了给自己的理论开路，他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总设计师似乎认为，自己的带有市场经济属性的“社会主义”——后来拓展成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经济政策是同门师兄弟。以此，来申明自己的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本源。

那么，列宁同志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新经济政策的呢？

“‘新经济政策’！一个奇怪的名称。这个政策之所以叫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它在向后转。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只是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才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向后退。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列宁全集》43 卷 196 页

列宁同志自己大大方方地承认，苏俄在当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我们要“后退一步”——引入资本主义的元素，譬如自由市场和私有制，先把生产力发展起来。我们就是要走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这条路也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所不得不走的。

我们伟大的总设计师却不屑于承认自己的小算盘,同样是在别家的瓜田中摘一个西瓜解渴，诚实的人会大方地跟瓜农打个招呼再摘，不怀好心的人则会下黑手偷一个，被瓜农发现了，还要拿锄头抡人家——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1982 年 9 月 1 日，总设计师为自己的理论起了个奇妙的名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之前，他就已经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笔者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反复琢磨，怎么听都不是滋味——邓小平的后继者们对其的解释是：这句话并不是在说“不管姓资还是姓社，能发展经济就是好制度”，而是在说“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与政治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的，都可以在实践中使用”。

笔者第一次听说这种解释，只觉得十分诧异，因为总设计师自己的解释，又和他的继承者大不相同。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选集》第 1 卷)

如此看来，邓小平第一次在政治上灵活运用“猫论”，是在农业生产的领域上，而不是在什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争论”上。按照官方记载，也的确是这样：1962 年 7 月 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1962 年 7 月 7 日，邓小平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谈到了农业生产管理政策的调整问题。他引用刘伯承经常说起的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表述他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这是“猫论”第一次被人熟知。

当然，这句总设计师的名言，早在文革之前甚至革命时期就是刘伯承和邓小平二人著名的的口头禅。关于这句话，毛主席有过评价。

他这个人（邓小平）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转引自 1976 年 3 月 28 日《人民日报》

与“猫论”同样著名的，还有“社资之争”的问题。1989 年，中国爆发了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乱，以反腐败为目的，这群全新的盲目接受资本主义思潮影响的年轻人走向了被和平演变的的道路，我们的总设计师才算吃到了恶果。1990 年，治理整顿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1989 年的颜色革命的阴影尚未从人们心头消除；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也摇摇欲坠。1990 年 2 月，北京一家大报刊出一篇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认为，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这篇文章矛头直指所谓对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聪明的总设计师则反驳道：“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笔者真是赞叹总设计师的理论水平！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他（邓小平）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1976 年 4 月 10 日《人民日报》)。私有化和市场化是相互独立的两码事，总设计师就算驳倒了市场化，又如何解释大搞私有化呢？

倘若借助市场的力量就能使中国富强，为什么民国时期的中国积贫积弱呢？为什么印度、拉美、非洲都贫弱不堪呢？如果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辅相成就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为什么凯恩斯主义因为滞涨而失败了呢？

说回先富论，要驳倒它，使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就够了。甚至更早一些，用奴隶主和封建地主们的学说就够了，我们在《圣经》中都能找到对其的反驳：“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新约·马太福音》）这就是著名的马太效应。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富有的人——即经过资本的积累后变成资产阶级的人，为了更加富有，会雇佣无产者为其劳动，借以榨取剩余价值。工人创造十元的价值，资本家只需要发给他一元的工资。这一点，剩余价值学说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阶级得分化已经完成之后，工人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拿到与资本家匹敌的财富，不仅如此，工人们越努力，资本家越富有，工人们反而越穷。相反，资本家却可以完全脱离出生产，真正地不劳而获。

马克思早就否定了“资本家能带动无产者富起来”的谎话，总设计师难道有什么能驳倒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吗？

且不谈理论，来谈谈现实。我们的党总喜欢把 1978 年 5 月 11 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对毛主席的迷信来当成一场伟大的胜利，一场“思想解放”，借以为邓小平的“新思想”铺路。总设计师也说：“中国如果出现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我们改革就失败了，我们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如果我们的改革出现两极分化，那我们就失败了。如果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了邪路。”中国何止出现了“亿万富翁”呢？又何止出现了“两极分化”呢？

基尼系数是一种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最低为 0，最高为 1，基尼系数越高，社会贫富差距越大。

2016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是 0.465，相比于 2012 年，基尼系数从从 0.474 降到了 0.465。而其他机构公布的数据则远高于此，西南财大公布的基尼系数为 0.62（之前为 0.61，略有上升），北京大学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数为 0.5，北京大学统计的资产基尼系数更是高达 0.78（之前为 0.73，有所上升）。

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 0.61，大大高于 0.44 的全球平均水平。西南财经大学的这份报告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 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 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 0.60。分地区看，中国东部地区基尼系数为 0.59，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为 0.57，西部地区为 0.55。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

国际惯例把0.2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时，则表示收入悬殊。无论采用哪个机构的统计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都已经越过了危险警戒线。

我们拿美国的数据来看：2016年，美国收入基尼增长到0.49，资产基尼为0.84。我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远高于美国，甚至连资产基尼系数都十分接近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中的问题不言而喻。

中国的基尼系数如此之大，似乎说明了地域差异导致的财富不均，但拨开其表层，里面仍然是阶级矛盾。我们无须讨论西藏和北京的居民收入差异，仅仅一窥同一城市中市区和乡村的差距。拿上海为例，2015年，上海城镇居民收入52962元，农村居民收入23205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一倍以上。

毫无疑问，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的贫富差距更大，这主要由地理环境和诸多历史问题导致。除朝鲜族、满族、蒙古族，其他少数民族的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汉族。不解决这样的民族财富差异，最终必然形成民族矛盾。

中国自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官方再也没有对这项统计公布过具体数字。在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中仅提到“从五项监测指标来看，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实现程度为79.8%”。之后，迫于压力的国家统计局一口气公布了2000-2010年的基尼系数，在这份报告中，在这高速发展的十年中，中国的基尼系数竟然一直稳稳地锁定在0.45到0.48。

笔者不禁要质疑，这个数据在发展中国家中并不算高，甚至低于美国。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十年内一直不愿公布呢？鉴于我国官僚机构的善于伪造数据体制内外公开的秘密，笔者又如何相信国家统计局这美好得让人怀疑在梦中的数据呢？况且，从调查过程来看，西南财大的调查基数更大，也更加严谨。所以笔者更倾向于相信0.6这个数值。或者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基尼系数只有0.5，又何尝不是一种失败呢？

这个数值是令人发指的，我们以基尼系数为0.61来计算，如果收入是对数正态分布的话，0.61意味着不到5%的人得到全国50%的收入。这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每当新的势力夺取统治地位时，先要夺得经济上的话语权，而在这之前，总要先拿到嘴上的优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是如此，总设计师想要“打破迷信”，本质上还是为了击碎毛泽东时代的生产方式，让资本主义大行其道。但实践也告诉我们，邓小平的主张并没有“消除两极分化”，更没有“实现共同富裕”。

反动派们用来反驳邓小平的失败的，也只有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腾飞这一把锈迹斑斑的剑了，他们欢呼道：“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富起来了！”为了打翻左派，他们张口就说起毛泽东时代的惨淡，尤其喜欢讥讽公有制经济下的“大锅饭“现象，说什么“社会主义养懒人”。真是笑话！这些话，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先哲早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解释得一清二楚：如果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会养懒人，那么让资本家不劳而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应该更加养懒人才对。更可笑的是，这些人还对于欧洲的高福利社会垂涎三尺，常常说：“北欧的莱茵资本主义才是社会主义！”笔者不禁要问问这群享乐主义者，如果说“大锅饭”会养懒人，那么无须工作便能获取足够多的生活资料的高福利制度岂不是更会养懒汉？

关于反驳前三十年一事无成论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了，笔者在这里不再赘述。笔者只引述一段1976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和工业建设成就，供大家参考：

1966年01月28日　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1966年05月0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
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
1966年12月23日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967年01月05日　中国石油产品自给自足，勘、采、炼技术登上世界高峰；
1967年06月17日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7年07月26日　中国第一台100吨矿山铁路自翻车研制成功；
1967年10月05日　中国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967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研制成功；
1967年11月29日中国最大的无线电望远镜安装调试成功；
1968年02月23日　中国特大型轴承制成；
1968年12月29日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南京长江大桥竣工，铁血上将许世友司令员命令第*装甲师的100多辆坦克同时开过，以检验大桥的质量；
1969年04月02日　第一艘万吨油轮"大庆27号"下水；
1969年05月05日　中国研制成具有独特疗效的抗菌素--"庆大霉素"；
1969年0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
1969年09月30日　中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千瓦双水内冷气轮发电机组建成，标志中国电机制造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69年10月03日　中国第一台5000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诞生；
1969年10月04日　中国第一座旋转氧气转炉投入生产；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 东方红1号卫星由长征1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开始了中国进军太空的万里长征；

1970 年 08 月 中国大飞机项目正式启动;
1970 年 10 月 16 日 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新疆哈密矿务局露天煤矿投产;
1970 年 12 月 25 日葛洲坝一期工程开工;
1970 年 12 月 26 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
1970 年 03 月 03 日　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1971 年 诞生了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
1971 年 06 月 27 日　第一艘两万吨货轮"长风"号下水;
1971 年 08 月 22 日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首次以核动力驶向试验海区，进行航行试验，从此中国海军作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海军跨入了世界核海军的行列;
1972 年 10 月 13 日连接中南和西南地区的重要干线湘黔铁路通车;
1972 年 12 月 26 日中国第一辆载重 300 吨的大平板车问世 1973 年 08 月 27 日　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3 年 09 月 03 日　中国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研制成功;
1973 年 11 月 08 日西藏军区在海拔 3800 米高寒地区大规模种植冬小麦丰收，这是西藏历史上农业发展的重要变革;
1973 年 12 月 20 日中国航空线已开辟到 80 多条，连接全国 70 多个城市，与 100 多个外国航空公司建立业务往来;
1974 年 02 月 17 日　新华社报道，胜利油田去年创年钻井进尺 150105 米的全国石油钻井最高纪录;
1974 年 03 月 30 日　地热发电站在河北怀涞建成;
1974 年 04 月 31 日　中国第一台医用电子感应加速器研制成功;
1974 年 07 月 17 日　中国冬小麦产区推广优良品种，占全国小麦播种面积的 80%以上;
1974 年 08 月 09 日　伞式太阳炉研制成功;
1974 年 09 月 12 日　中国第一个 5 万吨级码头建成;
1975 年 01 月 14 日　四川省开发天然气取得新成就;
1975 年 02 月 03 日　景山发电厂首次应用电子计算机控制 10 万千瓦燃煤气轮发电机组成功;
1975 年 03 月 29 日　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1975 年 07 月 05 日　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1975 年 10 月 07 日　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 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5 年 11 月 26 日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地球卫星;
1975 年下半年，连续发射成功了 3 颗人造卫星，被人们称之为"三星高照";
1976 年 03 月 22 日　邮电部门发展传真通讯技术;
1976 年 05 月 12 日　邮电职工建成全国微波通信干线;
1976 年 06 月 06 日　第一座现代化 10 万吨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
1976 年 08 月 23 日　第一艘五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在大连下水;
1976 年 12 月 11 日高速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我们在前面一直反驳"先富论"，不妨再来回顾总设计师的那段话："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总设计师的目的——至少是明面上的目的，还是"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简单概括，还是邓小平自己总结得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发展经济。我们对于改革开放的所有判断，也都是建立在"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华民族富强了"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事实真的像修正主义反动派所说的那样吗？所谓的改革的春天——1978 年的那场大会之后，改革开放全面实施。中美建交，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中国思想领域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欣欣向荣的自由的大讨论促进了政治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农业产值逐步提升；国企改革给中国经济灌入了新鲜的血液，扫除了官僚体系的积弊，开始充满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铺开，私营企业遍地开花，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经济一夜腾飞。真的是这样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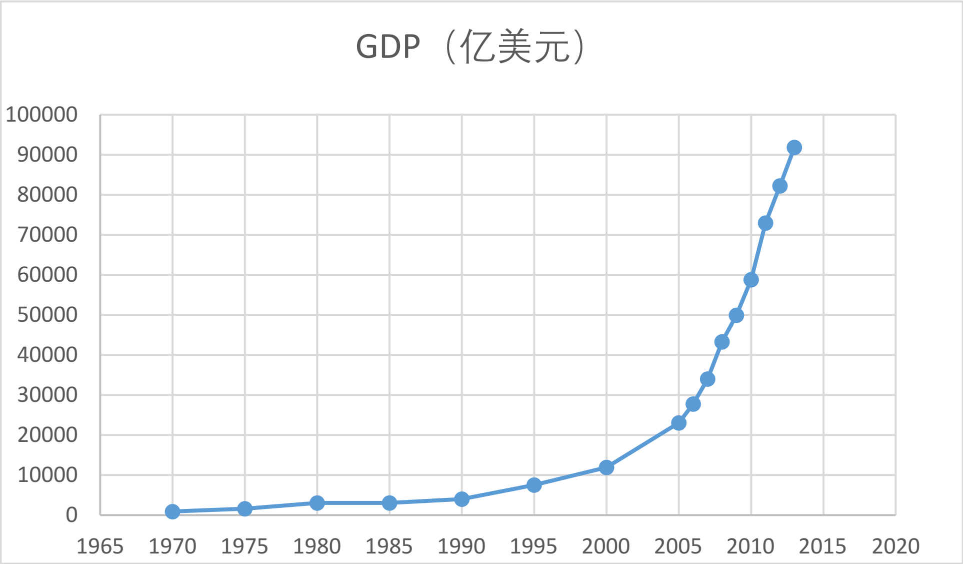
反动派尤其要让人们相信，改革开放的效果是那样的立竿见影。在他们的嘴中，八九十年代是快速发展的时代，自 1979 年起，中国才真正进入了现代社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列出具体数据，并带上笔者的评论，以供大家参考：

（一）生产总值

以下是 1970-2013 年中国历年 GDP:

年份	GDP(单位:亿美元)	排名
1970	915	8
1975	1612	9
1980	3065	8
1985	3091	9
1990	4045	12
1995	7570	8
2000	11928	6
2005	23027	4
2006	27738	4
2007	34004	3
2008	43274.48	3
2009	49912.56	3
2010	58786.29	2
2011	72981.47	2
2012	82270.37	2
2013	91,815	2



与我们想象中的不同，从数据来看，1979 年-1999 年，中国经济不但没有一夜腾飞，反而在徘徊中停滞——尤其在 1990 年，中国的 GDP 在世界上的排名竟然倒退到了第 12 名。整体来看，从 1979 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都未突破 10000 亿美元的大关。真正的经济腾飞，还是发生在 21 世纪之后的“黄金七年”中。这其中有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加入 WTO。

请同志们注意，“改革”和“开放”从来都不是两个必然联系的词。有人反驳说，不“改革”，保留大量的共产主义的革命色彩的意识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建交会充满阻碍。可事实是，中日建交是在 1972 年 9 月 29 日（当时称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中英建交是在 1972 年 3 月 14 日，中荷建交在 1972 年 5 月 18 日，中法建交则更早，是在 1964 年 1 月 27 日。即使是 1979 年的中美建交，也在 1979 年 1 月 1 日，在这之前的的 1972 年和 1976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就两度访华。由此可见，国力的增强和正确的外交策略才是决定外交的关键性因素。

“改革”和“开放”究竟孰轻孰重呢？其中的某一个是否还会阻碍中国的发展呢？关于这一点，学术界还有许多争论。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所说：“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之秘,谁就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笔者在这里不敢妄论。

笔者要说的是，倘若资本主义世界把日本封锁一年，日本的经济状况也一定不会比朝鲜要好。加入 WTO 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 1979-1999 年中国经济的徘徊增长，也说明了“开放”比“改革”重要得多。

截止 2000 年 6 月底，我国登记外债余额折合美元 1476.3 亿(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下同)，比上年末减少 42.0 亿美元，下降 2.8%。其中，中长期外债余额为 1334.1 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 32.4 亿美元，占总债务的 90.4%；短期外债余额为 142.2 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 9.6 亿美元，占总债务的 9.6%。

2000 年 1—6 月我国外债新签约 82.4 亿美元，新提款 132.7 亿美元，偿还外债本金 161.2 亿美元，汇率差及调整数使外债余额减少 14.2 亿美元。

在 1476.3 亿美元外债余额中，国家对外主权债余额为 473.6 亿美元，与上年末基本持平；国内金融机构债务余额为 378.8 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 7.4%；外商投资企业债务余额为 464.2 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 1.9%；国内企业债务余额为 146.4 亿美元，与上年末基本持平；租赁公司及其他事业单位债务余额为 13.3 亿美元，比上年末减少 17.9%。

——国家外汇管理局《2000 年上半年中国外债数据(2000 年 9 月 18 日)》

说回 1979 年之后中国经济的表现的问题，由数据可知，在 1979-1999 这二十年中，中国 GDP 的增长虽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一夜腾飞”，但毕竟还是在二十年中增长了近十倍，可是 1979 年之前的中国的发展几乎完全处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之中，中国也几乎没有外债，自 1979 年发行外债之后，

截至 2000 年，中国的外债已经高达 1477.3 亿美元，占当年 GDP 的 14%以上。在九十年代初，这个数据更高，1995 年，中国外债 1065.9 亿美元，占当年 GDP 的 34.4%以上。在 1991 年，中国债务率（外债余额与出口收入的比率）达到了峰值 91.9%。

项目/年度	外债余额(十亿美元)	外债余额比上年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十亿元人民币)	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1985	15.83	30.90%	904	13.50%
1986	21.48	35.70%	1030.9	8.90%
1987	30.2	40.60%	1210.2	11.70%
1988	40	32.50%	1510.1	11.30%
1989	41.3	3.30%	1709	4.20%
1990	52.55	27.20%	1877.4	3.90%
1991	60.56	15.20%	2189.6	9.30%
1992	69.32	14.50%	2706.8	14.30%
1993	83.57	20.60%	3552.4	13.90%
1994	92.81	11.10%	4846	13.10%
1995	106.59	14.80%	6113	11.00%
1996	116.28	9.10%	7157.2	9.90%
1997	130.96	12.60%	7942.9	9.20%
1998	146.04	11.50%	8488.4	7.80%
1999	151.83	4.00%	9018.8	7.60%
2000	145.73	-4.00%	9977.6	8.40%
项目/年度	负债率	外汇收入(十亿美元)	外汇收入比上年增长	债务率(%)
1985	5.10%	28.3	—	56.00%
1986	7.10%	29.8	5.40%	72.10%
1987	9.20%	39.2	31.50%	77.10%
1988	9.80%	45.9	17.20%	87.10%
1989	9.10%	47.8	4.20%	86.40%
1990	13.30%	57.4	20.00%	91.60%
1991	14.60%	65.9	14.90%	91.90%
1992	14.10%	78.8	19.60%	87.90%
1993	13.50%	86.6	9.80%	96.50%
1994	16.40%	118.9	37.40%	78.00%
1995	14.50%	147.2	23.80%	72.40%
1996	13.50%	171.7	16.60%	67.70%
1997	13.60%	207.2	20.70%	63.20%
1998	14.20%	207.4	0.10%	70.40%
1999	13.90%	221	6.50%	68.70%
2000	12.00%	279.6	26.50%	52.10%

当然，八十年代之后，虽然我国开始背负外债，但毕竟负债数值都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线以下。笔者要说的，是这笔外债和诸多外汇并没有用到实处。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甚至中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开始得到改善。这时，中国和世界都面临着同样的危机和机遇。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对外关系明显好转，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关系正常化，和西欧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签订了各种经济贸易协定、海运协定等,显然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对于西方来说，西方国家陷于 1970 年代的经济危机，希望寻找新的市场。

邓小平常说，在他之前的中国不愿意打开国门，其实在帝国主义的围堵之中，又如何能打开国门呢？这里就不得不涉及一个问题——“改革”和“开放”真的是一体的吗？或者说，“改革”和“开放”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哪个更大呢？

同志们一个早就熟知的“开放“政策，是 1973 年的“四三方案”。

1973 年 1 月，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建议在 3 至 5 年内引进价值 43 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之后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总额 51.4 亿美元。这是中国继 1950 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 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 26 个大型工业项目，总

投资约 200 亿元人民币，至 1982 年全部投产，成为 198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这之前，中国的石油工业随着 1963 年大庆油田产油 300 万吨，实现国内石油基本自给。到六十年代后期的“三五”计划时期，胜利油田、辽河油田等大油田会战成功，不仅满足了国内高速增长的石油需求，还有很多富余，具有对日出口原油创汇的能力。这是中国农业由依靠农家肥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转向大量依赖化肥、农药、农机灌溉排涝的石油农业的能源与原料基础。

在国际政治上，中国也把握住了机遇，中苏关系逐渐冷淡，欧美国家向中国抛来了橄榄枝。随着 1971 年 10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迎来了建交高峰，迅速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及泰国、马来西亚等亲西方国家建交，获得了广泛的外交承认，打破了 1949 年以来以西方世界为首的对中国的不承认、不接触、不来往的外交与经贸封锁。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开始了持续 17 年的外交蜜月期。

这也很好地反驳了“1979 年之前中国自我封闭”的论断，1972 年 1 月 22 日，遵照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报送了《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设备的报告》，经周恩来批示呈报，同年 2 月 5 日，毛泽东批准了该报告。1972 年 5 月 5 日，国家冶金部向国家计委建议从国外进口并消化吸收先进的一米七大型钢板冷轧机、以及配套的热轧机等国内钢铁工业急需的设备技术。同年 8 月 6 日，国家计委报送《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约需 4 亿美元。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972 年 11 月 7 日，国家计委报送《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涉及 23 套化工设备约需 6 亿美元。获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准。并要求国家计委把总额 33 亿美元的另一个进口方案报送中央

合并考虑。

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央立刻开始推动与西方阵营的合作。国家计委的方案，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十分积极地推动了，怎么能说七十年代的中国“闭关锁国”呢？

以下是“四三方案”引进的 26 个成套项目

“四三方案”引进的 26 个成套项目

类别	项目名称	年生产规模	累计投资（亿元）	建设地址	引进国	签约时间	开设时间	建成投产时间
大化纤	天津石油化纤厂	对二甲苯 6.4 万吨，苯 2 万吨，对苯二甲酸二甲酯 9 万吨	10.37	天津	日本，联邦德国	1975 年	1977 年 9 月	1981 年 8 月
大化纤	辽宁石油化纤总厂	化纤原料 13 万吨	24.15	辽宁辽阳	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	1973 年	1974 年 8 月	1981 年 9 月

大化纤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	化纤原料 10.8 万吨，化纤 5.2 万吨	20.79	上海金山卫	日本，联邦德国	1973 年	1974 年 1 月	1978 年 5 月
大化纤	四川维尼纶厂	化纤 4.5 万吨，醋酸乙烯 9 万吨，甲醇 9.5 万吨，乙炔 2.6 万吨	7.2	四川长寿	法国，日本	1973 年	1974 年 8 月	1979 年 12 月
石化	北京石油化工总厂	乙烯 30 万吨，高压聚乙烯 18 万吨，聚丙烯 8 万吨	23.7	北京房山	日本，联邦德国，美国	1972 年	1973 年 8 月	1976 年 12 月
石化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	11.5 万吨乙烯，乙醇 10 万吨，丁苯橡胶 8 万吨，辛醇 5 万吨，正丁醇 6590 吨	2.09	吉林	日本，联邦德国	1975 年	1976 年 12 月	1983 年 12 月
石化	北京化工二厂	氯乙烯 8 万吨，聚氯乙烯 2,.5-7.5 万吨	1.39	北京九龙山	联邦德国	1973 年	1974 年 10 月	1977 年 7 月
大化肥	沧州化肥厂	合成氨 30 万吨，尿素 48 万吨	2.39	河北沧州	美国，荷兰	1973 年	1973 年 7 月	1977 年 12 月
大化肥	辽河化肥厂	合成氨 30 万吨，尿素 48 万吨	3.48	辽宁盘山	美国，荷兰	1973 年	1974 年 6 月	1977 年 12 月
大化肥	大庆化肥厂	合成氨 30 万吨，尿素 48 万吨	2.43	黑龙江大庆	美国，荷兰	1973 年	1974 年 5 月	1977 年 6 月

大化肥	湖北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2.45	湖北枝江	美国，荷兰	1973年	1974年10月	1979年8月
大化肥	洞庭湖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2.50	湖南岳阳	美国，荷兰	1973年	1974年4月	1979年7月
大化肥	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2.40	四川泸州	美国，荷兰	1973年	1974年4月	1977年3月
大化肥	赤水河天然气化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2.73	贵州赤水	美国，荷兰	1973年	1976年1月	1978年12月
大化肥	云南天然气化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2.77	云南水富	美国，荷兰	1973年	1975年1月	1977年12月
大化肥	栖霞山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52万吨	2.98	江苏南京	法国	1974年	1974年9月	1978年10月
大化肥	安庆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52万吨	3.01	安徽安庆	法国	1974年	1974年3月	1978年12月
大化肥	广州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52万吨	3.14	广东广州	法国	1974年	1974年12月	1972年10月
大化肥	齐鲁第二化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2.47	山东淄博	日本	1973年	1974年4月	1976年7月

大化肥	四川化工厂	合成氨30万吨，尿素48万吨	2.61	四川成都	日本	1973年		
大型电站	大港电厂	2　25万千瓦	4.50	天津北大港	意大利	1973年	1974年12月	1979年10月
大型电站	唐山徒河电厂	2　32万千瓦	5.30	河北唐山	日本	1973年	1973年12月	1978年3月
大型电站	元宝山电厂	1　30万千瓦	3.92	内蒙古赤峰	法国，瑞士	1973年	1974年9月	1978年12月
钢铁	武汉钢铁公司1.7米轧机	冷轧板100万吨，热轧板100万吨，硅钢7万吨	38.9	湖北武汉	日本，联邦德国	1974年	1972年3月	1978年12月
钢铁	南京钢铁公司氯化球团	30万吨硫酸渣氯化球团	1.00	江苏南京	日本	1976年	1978年1月	1980年12月
钢铁	南京烷基苯厂	正构烷烃5万吨，直链烷荃烃5万吨	2.21	江苏南京	意大利	1975年	1976年10月	1981年12月

另，还有43套机械化综合采煤机组,以及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单个项目。

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也许这位领导人领悟到了这绝佳的机会，他继承并发扬了“四三方案”，开始大量引进外资，为了与“四三方案”区分，华国锋的政策一般被成为“八二方案”。可惜的是，“八二方案”反而成为了“洋跃进”，中央相继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指标，华国锋的政策算是失败了。

邓小平执政后，也同样发扬了“四三方案”，而他的计划则更加让人迷惑不解。在当时，中国的汽车市场还很狭小，中国的国产汽车也多是卡车这样的工程用车。我们的同志们所熟知的一项闹剧就在这时上演了，在诸多国防项目因为缺少资金而下马的八十年代，在“军队要忍耐，可以自己经商”的困难的八十年代，中国竟然放弃了与德国大众的合资项目，转而进口了一百万辆小汽车——这一百万的数字，还没有考虑相当一部分从免税进出口省市进入国内市场的保守估计。

大量引进西方工业制成品，拓展国内市场，的确能刺激国内经济。八十年代，我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还很低，但是却似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对于城市工人来说，工作中浑水摸鱼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铁饭碗”相较于“大锅饭”更加让人舒适，自己干不动了，甚至还能让儿子来继承；对于新的资产阶级来说，政府滥发贷款的政策让他们有了“大施拳脚”的机会，其中的大多数人显然低估了市场的残酷，他们大多破产，银行的贷款也无法偿还。我们现在看当时的统计数据，四大银行的坏账率已经达到了 30%（一说50%以上），要不是四大银行属国有，其实它们早已经破产了。

1988 年，通过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模式制造繁荣的后果出现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和大涨价沉重地打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我们前面说到了，城市工人和新的资产阶级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红利，中部农民则承受了时代的剥削，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税务的增加使得底层农民极度愤怒，在整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政府部门的大楼前总是围堵着一群农民，农民们甚至常常敲掉政府办公楼的石砖解气。关于这一奇景，已经有很多文章介绍过了，笔者不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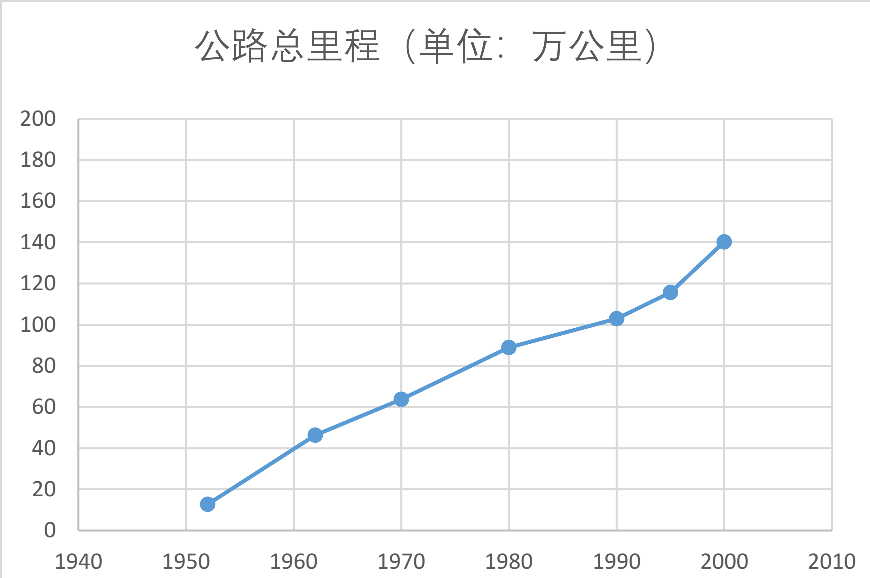
在一切像极了圈地运动，如果说欧洲的圈地运动是羊吃人,我国的圈地运动就是地吃人。为了给城镇化开路，只好对农村进行强拆，如果拆不动，政府就会雇佣黑社会强拆。这也产生了八九十年代一道特殊的风景线：黑社会驻扎在派出所里，黑社会老大们唆使自己的老婆或情人与派出所的警官进行性交易。

（二）基础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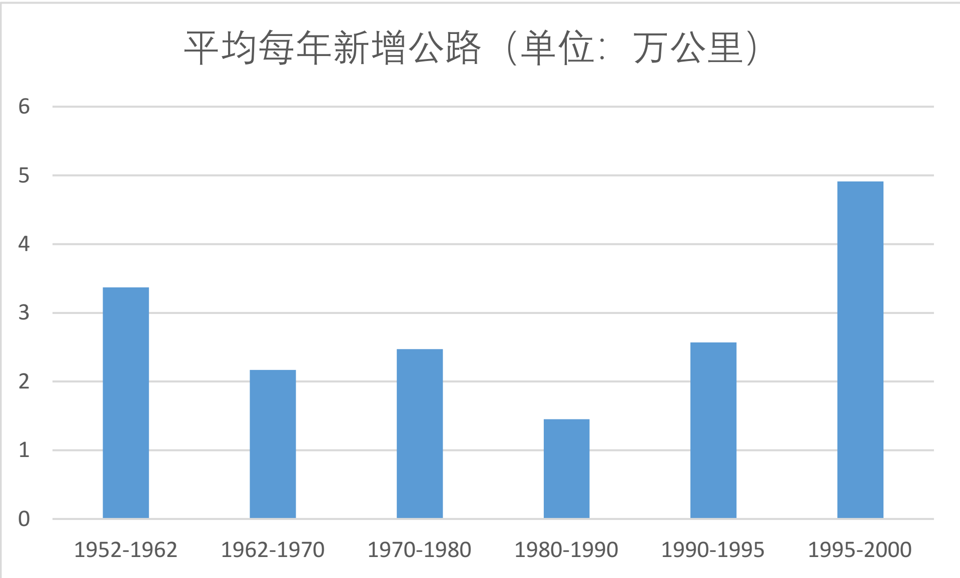
在社会主义国家谈 GDP 和债务率，难免是缺乏说服力的。接下来，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工农业生产总值来继续讨论。

首先是基础设施，我们拿公路来举例：

1950-2002 年中国公路里程：



数据显示，1950-1980 年，中国公路里程增长总量约为 75.66 万公里，平均每年增长 2.522 万公里；1980-2000，中国公路里程增长总量约为 51.94 万公里，平均每年增长 2.597 万公里。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二十年里，公路里程的年增长量竟然与所谓“不经济”的时代相差无几。



再来看看新增公路的增长速度吧，由数据可知，改革开放之后的十五年里，尤其在 1980-1990——那个我们大多数人心中快速腾飞的十年里，平均每年新增公路里程达到了最低点——每年 1.45 万公里，这个增长量甚至还不足 1951-1962 这困难的十年的一半。

1949-1995 年中国铁路里程：

年份	里程（单位：万公里）
1949	2.18
1950	2.22
1950-1977	——
1977	4.74
1978	4.86
1979	4.98
1980	4.99
1981	5.25
1982	5.02
1983	5.05
1984	5.16
1985	5.17
1986	5.25
1987	5.26
1988	5.28
1989	5.32
1990	5.34
1991	5.34
1992	5.36
1993	5.38
1994	5.4
1995	5.46

由数据可知：

1950－1980 年共修铁路 2.77 万公里，平均每年 923 公里。

1980－1995 年共修铁路 4700 公里，平均每年 313 公里。

1950－1978 年共修铁路 2.64 万公里，平均每年 942 公里。

1978－1995 年共修铁路 6000 公里，平均每年 353 公里

——《中国历年公路和铁路的总里程》

由此可见，1980-2000 年的二十年中，中国的交通建设未取得大的进步，相对于1949-1970 年，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

除了交通，其他方面的基础和生产设施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最典型的例子便出现在农业上，1980 年，中国水利系统能够灌溉 16 万平方公里的农田，到 1990 年，这个数据反而缩水到了 15.8 万平方公里。即使到了现在，中国大多数农村的水利设施也还在依靠七十年代或更早之前的老本。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改革”，在农村和城镇都有所体现，在农村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替代了人民公社；城镇则是国企改革。我们先说前者。

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生产积极性”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神话，很多文章已经批驳过了。同志们请注意，忽视客观规律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强力条件，只谈所谓的主观能动性，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错误。自蒸汽机发明之后——甚至自锄头发明之后，人们就意识到了肌肉无法与机器比效率。假设责任制真的能促进生产积极性，又如何和机器去比呢？按照一般的思路，在四三方案已经大量引进机械和化肥的情况下，在 1979 年发展农业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建立农业工厂，把农民变成农业工人，进行大片的机械化作业。而我们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把土地分给个人，重新采用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制度。

我们的总设计师的继承者们，把小岗村的“成功”描绘成一项巨大的胜利，他们是这样说的：1978 年 11 月 24 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 18 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 18 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1978 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

好一个“伟大壮举”！笔者不禁想问：如果分田单干就能促进生产，那么民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岂不是应该远超人民公社时期吗？不仅如此，自商鞅变法之后，封建小农经济统治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为什么封建社会就不能取得 1979 年之后中国农村的“辉煌”呢？

1949 年建国到 1985 年人民公社解体，我国粮食总产量增长 235% 人口增长 95% 人均粮食产量增长 71%。

然而 1986 年人民公社解体到 2008 年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增长 23% 而人均粮食产量则只增长了 9%。

截止“五五计划”结束时的 1979 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 7.3 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 1/4，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提高到了 46%，处世界领先地位。同时还完成 2.6 亿亩的除涝和 6200 万亩的盐碱地治理。

其实在小岗村之前，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验就已经开始了，而这场实验以完完全全的失败告终。可见“生产积极性”并不能促进农业产值的进步，令人唏嘘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实上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果同志们去农村调研的话就能发现，自中国其实已经找不到多少“真正的农民”了，大多数农民都抛弃自己的土地进城打工。据统计，自 1975-1985 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减小的，但是，1985 之后又逐渐扩大。自 1989 年之后农民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甚至有些农户无心种地，生产积极性低。

相较于人民公社，分地单干的劣势已经很明显了。以下摘自《当代农村为何众口一致谴责“包产到户”》

一、分散经营，使农民耗费了大量的体力，在农忙的时候，他们说自己干活累得甚至比牲口还要累。因为牲口白天干完活夜里就可以休息，而农民则还要忙乎其他的事情。这十几年来，在县城的广告中，绝大部分都是治疗腰脊劳损、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等疾病。这都是在包产到户的最初几年落下的，因为那时候集体的所有机械都被分光卖净了，都要靠人工来干。提到那个时候，一些五十岁以上的农民都要伤心落泪的。我们在农村看到的一些老年农民的走路姿势和电视剧中的那些农民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过度劳累而落下的畸形身材和走路姿势。

二、农田基本建设的损毁，是农民的资金投入加大。在当代农村，原来在毛泽东时代所建造的农田建设，特别是水利基本建设都基本毁坏贻尽。现在，农民对农田的灌溉成本要加大到三到五倍左右，而且耗工耗时又费力。过去在生产队的时候，用河水灌溉，普浇一遍农田只需要几个人用几天的时间就够了。现在，河道被那些自私自利的农民给毁掉了。每家每户都必须用井水来浇灌。一遇到旱情，几乎是全村人都要出动，去抢占机井，都想先浇自己的地。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纠纷。结果半个月的时间也灌溉不完。

三、盲目种植，由于农民的思想素质参差不齐。购买的种子质量好坏不等，到了秋收季节，产量的差距就非常大。比如玉米，产量高的有一千五百斤，产量低的只有三四百斤。令那些农民叫苦不叠，一年的希望就打了水漂。到了第二年，一些农民为了贪便宜还是照样上当。用农民的话说，是“越瘸越用棍子敲”。

四、因为地块小，农业机械施展不开。在农村，由于地块的土质。在过去分地时，每快地都要平均分配。有时候一家人的五亩地会分成六七块，大型机械用不上，有的连小型机械也同不上，种地只好用人工拉犁拉耙。恢复了秦汉时代的“传统耕作方式”，看到那种情形，觉得对当代那些资改派的一种极大的讽刺。然而受苦受累的还只是那些生活在最低层的农民。而且几乎每家每户都要配备全套的小型机械，都价值两到三万元，造成了资金和机械的极大浪费，农民们对此啧有烦言。

五、不能合理的施用化肥。现在的商家为了挣钱，竞争非常厉害，什么招数都能使出来，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假化肥假农药屡禁不止。农民们是防不胜防，真的是“上了一当又一当，当当上的不一样”，一年的收成说没有就没有了。许多农民告诉我，要是在过去的生产队时，有专门的技术员，他们懂科学技术、会识别真假，什么心都不用操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农民掌握不好施肥量，看见别人施肥多的产量高，便也拼命地朝自己的田地里施肥。结果事与愿违，不是倒伏就是因施肥过量而减产，费钱又费力，产量却是最低。

六、施用农药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农药的选择也很重要，庄稼有了病虫害，就需要用适合对症的农药去打，由于多数农民都不大懂科学技术，大都是靠听商家的一面之词。也不免经常上当受骗。即使说能买到真正的好农药，也照样发挥不了作用。因为都是一家一户，每一家农民打药的时间是不一致的，先打药的农田的虫子都飞到临居的庄稼地里去了，而过了几天那个邻居又要打药，虫子又都飞回这边来。有时候需要打两三遍也解决不了病虫害的问题。

七、土地纠纷问题，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以来，农民们不得不“各人自扫门前雪”，有的喜欢贪便宜的人总是对邻居的土地搞“蚕食政策”，因而经常发生纠纷。有的甚至大打出手，形成了刑事治安案件，弄得两败俱伤。

八、发生土地纠纷，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现行的“三十年不变”这个“不合情不合理却合法”的土地法。这个土地法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不公。到处的农民都向我强烈反映这个问题，几乎是到了“义愤填膺”的程度。有的三口人种植着七口人的土地，而有的七八口人却种植着两口人的土地，这就形成了新的不公。我认真地研读过那个“土地法”，有四个非常大的漏洞，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那部“土地法”是一些根本不懂农村情况的“专家”和“学者”制定出来的。真的是害国又害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把这些“完全正确”的条款给改正过来。因为时间越长，积累的社会矛盾就会越深。

九、在精神文明方面，包产到户给农村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更是巨大的，无法弥补的。由于一些农村组织结构管理属于无为而治，素质高的农民总是吃亏，而素质低的农民却往往能占到便宜。一些公益的事业，往往因为那些落后农民的阻拦就会被阻止。比如村里的水泥路、村里的村委会的建设、村里的文化活动都经常因为少数人的胡搅蛮缠而不得停止。

要说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失败，最好的例子还是那个“敢于开拓”的小岗村。这里有一个著名的笑话，小岗村在分田单干后“取得巨大的成功“后，却在 2018 年才脱贫。而小岗村脱贫的秘密，竟然是重新转变回了集体经济。

2006 年，沈浩在村民大会上提出了酝酿已久的发展思路：把土地集中起来，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发展合作社”为龙头，整合资源搞适度规模经营。全村 1800 亩耕地，扣除前些年办的 400 亩葡萄园，村民以土地持股的形式成立合作社。如今各地农村合作社都是带头人沈浩书记带领干的。

经过沈浩书记的努力——集中土地，重新兴办合作社，小岗村才走出了贫困。这是沈浩书记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是对大包干最大的讽刺。沈浩书记由于过度劳累而倒在了脱贫第一线，笔者在这里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而我们的御用文人们又是如何做的呢？他们在大肆赞扬了大包干的好处之后，竟然又顺风而动，对集体经济合作社崇尚至极。

11 月 16 日，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推进会在南京举行。会上，农业农村部首次为凤阳县小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等 10 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颁发登记证书，这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了“身份证”。

——《小岗村喜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身份证”》(《安徽日报》2018 年 11 月 23 日)

“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2019 年全村股东每人分红 580 元。”1 月 18 日下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迎来了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第三年分红。“家家住上小洋楼，一年比一年好。”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金昌笑着说道。"

——《小岗村的幸福事》

亲爱的同志们啊，笔者想尽办法写出的讽刺的词句，也比不上这两篇报道所产生的效果的百分之一。

再来说说城镇上的改革，总设计师似乎极度同情底层人民，他说：一切发展都不能以牺牲民生为代价。言下之意则是职责毛泽东时代“只知道阶级斗争，忽视了民众对经济发展的要求”。说得真是理直气壮！我们看看后人对于邓小平的执政理念的总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形成了“以民为本”的再分配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再分配理论，与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分配的公平问题结合在一起，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为社会公平问题解决提供了思维理路与实践方法；为把民生问题置于党的大政方针上确定了根本原则；为党的十六大以来，坚持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的大政策、大思路落于实处；为解决经济再分配中的差距迈开了新的步伐，并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推进到了崭新的起点。

——《邓小平“以人为本”的再分配思想》

好一个“以民为本”！ 1985 年，以《中共中央关于在城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为标志，到了九十年代，国企分流所导致的六千万人大下岗开始了。与我们想象中的不同，这场大下岗并不只涉及国企，连私企也不能幸免。

为了安抚民众，1999 年，中国最大的文艺盛会——春节联欢晚会上，出现了一场彻底的闹剧，小品演员黄宏试图用“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的古怪台词来制造欢乐——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管小品的作者是在讽刺还是在奉旨行事，这场拙劣的表演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事故。其实在这之前的 1997 年，歌唱家刘欢就演唱了一首《从头再来》以“鼓励”下岗的工人们，这首歌甚至还在 1999 年获中宣部及北京市宣传部“五个一工程”作品奖。

昨天所有的荣誉
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
今夜重又走进风雨
我不能随波浮沉
为了我挚爱的亲人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
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心若在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昨天所有的荣誉
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
今夜重又走进风雨
我不能随波浮沉
为了我挚爱的亲人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
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心若在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心若在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心若在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心若在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九十年代大下岗其实并没有在短期内造成多严重的社会问题——至少相对来说，与懒散的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的这场灾难不过是阵痛罢了。

我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矛盾，十九大报告也做了总结，将其称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总书记则直接将其统称为“新常态”，对其的解释则是“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众多，地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造成贫富分化”，笔者已经在上文列举了，即使在同一城市中，

贫富差距也极其明显。可以见得，所谓的“地域矛盾”，所谓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说到底还是对阶级矛盾的美化的说法。说到底，还是剥削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严苛。

我国常常标榜自己“以公有制为主体”，好一个“公有制为主体”！如果从 2005 年民营经济的 GDP 所占的度 65%中，扣除集体经济所占的部分（估计约为 8%），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中的私资部分（估计至少为 4%），则非国有制经济 GDP 中所占比重为 61%（65%－8%＋4%）。相应地，国有制经济 GDP 所占比重为 39%。按照上述的私营经济每年增长 2 个百分点测算，2006 年全国 GDP 中，国有制经济与内私有制经济比重分别为 37%与 63%。目前，私有制经济比重还在继续上升，向电力、铁路、邮电、航空乃至国防工业等重要部门扩展。

我们的党在自己的报告中自豪地说：民营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

我们的党为逐年被压缩的国有制经济做解释时又是另一副嘴脸，辩护者们说：交通运输行业、航空工业、通讯行业、银行业、保险业、能源领域、粮食生产领域、基础教育领域、军工领域、航天领域、尖端技术领域等国家经济命脉还都是国有制。真是大言不惭！实行公有制的根本目的是消灭剥削，而不是国家安全。我们的大多数劳动群众都在私企中工作，这就意味着全社会得劳动者都在受到剥削，而且这样的剥削日渐严重，这就是我国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得根本原因。

即使在国有制经济中，工人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私企无非是资本家当道，“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天经地义”，而国企长期被红色贵族们把持，官僚风恒星，在很多时候，工作环境甚至还不如私企。这样的“国企”，怎么能称得上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呢？

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要看它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是一切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先从经济的角度辨析社会，才能搞清楚这个社会的社会性质。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难道是单纯地同情无产阶级吗？不，我们的目的非常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即将把它的所有生产力释放完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目的既不是吊死资本家，也不是让无产阶级当统治者，而是换一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新的生产方式。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发展都奉行一条神圣的法则：经济繁荣程度等于社会发展水平。其实不然，沙特经济再繁荣，它本质上也是个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它的社会发展水平甚至还不如印度。我们的误区，无非还是陷入了只看眼前利益的陷阱。我们国家为了发展，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迟早有一天要爆发危机。

在“南方谈话”中，总设计师大言不惭地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多么义正言辞！难道解放生产力就是发展私有制经济吗？难道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了“发展生产力”，还要退回到封建土地的生产方式中去吗？

二、政治

历史唯物主义描述的历史图景中，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它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这些阶级互相博弈的结果。

任何一个阶级，只要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财富，就会产生政治诉求，就会要求统治这个社会。譬如十七世纪以后，资本的原始积累逐渐完成，资产阶级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并且发展本阶级统治和所适应的生产方式受到了旧的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阻挠。此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就开始表达政治诉求，于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便爆发了。

当先富起来的资本家积累了足够的钱财之后，他们就要进军政治界了。且不说那些把北京当成自家后院的红色家族的子孙们，我们能看得见的资本家：马云是中共党员；马化腾是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任正非是中共党员，人大代表；王健林是中共党员，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李彦宏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副主席，还兼任第八届北京市科协副主席；鲁冠球是中国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资产阶级在中国兴起之后，便开始挤压广大无产阶级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宪法规定，我国是一个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工农兵的占比是多少呢？

1978 五届人大，代表共 3497 人， 工农兵比例占 61.68%，工农占 47.3%
1983 六届人大，代表共 2978 人， 工农兵比例占 35.57%，工农占 28.6%
1988 七届人大，代表共 2970 人， 工农兵比例占 32%，工农占 23%
1993 八届人大，代表共 2978 人， 工农兵比例占 29.6%，工农占 20.6%
1998 九届人大，代表共 2979 人， 工农兵比例占 27.8%，工农占 10.8%
2003 十届人大，代表共 2985 人， 工农兵比例占 27.4%，工农不足 4%

好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占全国人口 90%的工人、农民、士兵，在全国人大中的位子竟然不到 30%，其中除掉解放军中的红色败类，工农中的工贼，真正的代表广大劳动群众的人大代表，可能连 1%都不到。

无论那群龟缩在中南海的政治家再怎么花言巧语，再怎么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挡箭牌，都无法驳倒一个确凿的事实：中国已经彻彻底底地步入了修正主义的歧途，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再次狠狠地压在了人民的头上。

这就是所谓的“先富带动后富”吗？先富起来的纷纷化身官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们会俯下身子“为人民服务”？何不期待黄鼠狼给鸡拜年呢？

祖国之所以看起来还冠着"社会主义"的姓氏，无非是因为之前留下来的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机器在发挥余热罢了。

说完了对内，我们再来看看对外。

随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恰逢像邓小平和其他的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谴责的人“复出”， 中国的国际政策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导致了我们之间的许多分歧和矛盾。 然后，在 1974 年 4 月，邓小平在联合国发表了著名讲话，在其中他炮制了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过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路线迥异,却与赫鲁晓夫及其弟子类似并在本质上与其相同的国际路线。在我们与中国共产党关于邓小平演讲的 1974 年 8 月的会议上，我们对他的机会主义国际路线做出了严厉批评。 我们的争论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们得到的唯一答复是带着最大的冷嘲热讽的话：“这是毛主席的国际路线，” 在 1975 年初，我们党的领导被告知中国共产党拒绝讨论其国际路线的变化，尽管如此，我们坚定地重申我们对邓小平的国际路线的批评，尤其是这个路线导致了一个反动政策，中国官方人士的倾向开始转向智利法西斯军政府。这是我们两党之间的最后联系。

……

……在智利事件中，前总理周恩来致电慰问前总统阿连德遗孀，他表示对阿连德去世的“悲哀和愤慨”，根本未提到数千数万的工人未经任何判决即被法西斯军队执行屠杀，酷刑和监禁。

关于在智利镇压各方面的新闻只在政变的月份里仅仅出现一次，并且报道没有任何评论或意见。此外，出版物似乎不想谴责军政府犯下的暴行，它转载了几则谴责声明，但都是别人发出的。我们指出，这一切与世界各地对智利的法西斯暴行的谴责形成了对比。此外，我们还指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会议在当提出谴责皮诺切特和他的心腹的提案时离开不参加投票。我们发现中国官方界的态度被智利法西斯政权官员热烈赞扬，例如外交事务副秘书长 1975 年 1 月主张：“人民中国在国际会议中支持智利”，而没有任何语句或文字上的冲突。

……

在目前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更严厉的指责你们与血腥的智利法西斯政权的关系：没有比比今年八月（译者注：1977 年）中国大使亲自赠送独裁者皮诺切特礼物，在此过程中与其合影，并做了大意是 “两国关系一直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并且中国有意加强和扩大这一关系的发言。最后，十月中旬，这位大使离开智利前他的亲法西斯活动达到了顶点，声称他留下了“对智利和智利政府非常好的印象”。讴歌对智利人民实施大屠杀，酷刑，并进行超级剥削的屠夫难道不是对智利人民的侮辱吗？对世界各国人民来说，中国扮演的不是一个公开破坏革命的角色吗？

……

……你们的怯懦和无耻还真是没有下限！……

——1977《智利革命共产党致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

邓小平执政之后，中国便彻底放弃了对亚拉非社会主义革命的援助，即停止了输出革命。我们知道，邓小平的口号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初期，

为了引进外资、联美抗苏，暂时终止输出革命可以解释为向现实的妥协，但如同容忍私有制一样，修正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将停止输出革命贯彻到底，不仅停止支援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去勾结压迫亚拉非人民的反动政府，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在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期间，全球各地爆发起义，加上中国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古巴革命、拉美游击战，西方的新左派、民权运动，具战斗精神的黑豹党、德国红军派、日本赤军，以及在各地类似的、带武装的“解放阵线”组织，以至稍有起色的劳工运动——有一段时期，世界革命似乎不但是可能，而且即将到来。所以当时有一句流行话：“东方已红，西方也预备好了”（The East is Red, and the West is Ready）。但这股激进潮流很快就在 80、90 年代保守主义的反扑、中国改革开放和东欧剧变之中又一次消退了。

国际共运转入低潮，而我们的二共似乎对于自己卑劣的行为感到十分自豪，以下是《北京日报》在 2011 年的一篇文章：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而之前中国在极左时期一直称新加坡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邓小平吃惊地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时，他承认对方实行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方针是对的。

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倒让李吃了一惊，但他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 74 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次新加坡之行，邓小平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啊。是这种谦虚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保证了大转折时期的平稳过渡。

——《北京日报》2011 年 7 月 11 日第 19 版《邓小平决定停止输出革命》，作者：梁衡（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多么伟大！我们伟大的设计师是多么仰慕新加坡啊！——一个靠收取过路费而致富的暴发户，一个国防全权交给美国控制的“对外开放”的“主权”国家。文章的作者——著名的作家梁衡先生，用热情的笔调写道：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啊。真不愧是当代最伟大的文学家！能把叛变革命写成这等荣耀！

笔者曾经与梁衡先生有过一面之缘，笔者对于老先生的文笔十分钦佩，真不愧是党的好干部，当代的陶希圣！

十九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产生，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它的暮年。为了维护自己那颤颤巍巍的大厦，帝国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了极端的敌意。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输出革命便成了必要的了，一可以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从内部瓦解帝国主义国家；二可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在宏观上对抗资本主义世界。

在今天，输出革命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主动出击，资本主义世界就会朝我们输出颜色革命，血的教训就在前面——在香港发生的暴乱就是如此。主席说的很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们常常标榜自己打开了国门，嘲讽毛主席“不经济”“闭关锁国”，真是倒打一耙！为什么你们打开了国门，却连输出革命都抛弃掉了，倘若在八十年代停止援助世界革命是为了“建设经济”，那在中国富强之后，你们为什么还保持沉默呢？我们对外的“援助”少吗？不少，我们常常听到中国如何援建非洲，可那本质上是输出资本，是与国外的资本家勾结，工贼和我们被迷惑的人民还要嘲讽一下非洲的阶级弟兄们：我们给了你们那么多钱，你们还那么穷，一定是懒吧！

不得不赞扬习近平政府，与邓、江、胡政府相比，习政府有了足够的资本与国外抗衡，不再那样怯懦了。可是这又如何呢？我们还是不“敢于”输出革命，就像戈尔巴乔夫以为自己带领苏联人民走向自由的康庄大道，西方就会接纳他们一样——所谓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所谓《国际法》，也不过是大国意志的体现。现在我们迎合的“国际准则”，无非是对西方有利的规则罢了。倘若完全依照这些破文字行事，那么离被和平演变也不远了。

这里不得不提一个笑话，是新华社历年对于尼共毛的态度：
2002 年：“恐怖分子袭击首都，屠杀当地大学生”
2003 年：“探访丛林之虎，尼皇家陆军誓师歼灭暴徒”
2004 年：“尼泊尔内战升级，形式日趋紧张”“尼叛军只是冒用毛的旗号”
2005 年：“探访尼共营地，尼政府军依然占据优势”
2006 年：“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包围首都”
2007 年：“伟大的尼泊尔共产党主席普拉旺达万岁，中尼友谊天长地久”
同志们，新华社的外交措辞，给我们生动地演示了什么叫革命投机主义！我们常常拿“伟大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勇猛的装甲师抵达了它忠诚的巴黎”来讥讽法国在二战中的不作为，我们在革命中又何尝比法国人勇敢呢？

三、文化

当代中国的思想极度不自由，是有目共睹的。最可笑的是，我们的人民现在已经示言论自由为洪水猛兽了。说起文化上的解放，人们就想起言论自由，接着又想起西式自由，再接着就想起美国的枪战了——随即，便瑟瑟发抖起来。

不错，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现在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必然造成帝国主义的渗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东欧诸国的教训在前。可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当代中国经济基础中已经融入了巨量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不可能在一个有着自由市场的社会被堵住，1989 年的颜色革命就用实际打了总设计师的脸。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想进行高压统治，那无非是法西斯主义。

我们常常批判，西方世界的人民被金融寡头忽悠得团团转，明明是待宰的羔羊，却为自己有在羊圈中奔跑的的自由而感到骄傲。可笑的是，我们的人民不是连在羊圈中奔跑的自由都没有吗？西方民选总统，虽然对于总统来说，民众只是选票，他们的爱民只是假惺惺地装装样子，但我们的人民岂不是连选票都不是吗？笔者以为，西方这一点做的还不错，至少让人民觉得自己有自由；而我们的修正主义政府连装装样子都不会，真是吃力不讨好。

事实上，我国当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渗透几乎没有任何防备，反而对于我们的同志的红色宣传大打出手。譬如组织纪念列宁一百五十周年大会的一位学社的社长黎怀同志，在大会之后随即被捕，至今下落不明；佳士事件之后，先进的左派学生团体去韶山纪念毛主席，竟然被警察驱赶。这一出出闹剧，不禁让人想起那禁止民间传阅《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朝鲜。好一个“思想解放”！

修正主义中国的思想领域——尤其是政治上的思想领域，已经进行了长达两三代人的去马列毛的演变。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立国思想，只要稍加扭曲便是；而对于毛主义，则要彻底地淡化，嘴上说着“学习毛泽东思想”，背地里搞的却是黑猫白猫的那套。最典型的实例便是 1977 年他们对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行为。这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一直为修正主义者们津津乐道，传说 1977 年恢复高考之后，由于文革造成的经济低迷，连印刷试卷的纸张都不够，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把印刷《毛选》第五卷的纸全部用于印刷试卷。

笔者不禁佩服这个妙极的故事，它简直完全符合了毛主席逝世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政治正确。“1977 年恢复高考”，正巧是毛主席逝世后的一年，把阻碍文化进步的罪名扣到了毛主席头上；“文革造成的经济低迷”，以至于“连印刷试卷的纸张都不够”，把阶级斗争和贫穷绑在一起，还要渲染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贫苦借以突出总设计师的伟大的历史功绩；“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将纸张用于印刷试卷，又巧妙地将邓小平塑造成了一个善于变通且对于文化事业十分看重的领导人；“决定把印刷《毛选》第五卷的纸全部用于印刷试卷”，瞧瞧这句，说得多好！把印刷《毛选》和高考的冲突写得像真的一样！既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和文化事业的冲突”，又在潜台词中说“毛主席大搞个人崇拜，即使死了也要把自己的书印出来，还要跟高考抢纸用”，又强调了一遍文革时期的纸张稀缺到了什么程度——真是堪比《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事实上，这个故事竟没有一个字是符合历史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77 年 4 月开始正式向全国发行。4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前夕，1977 年 9 月 8 日，新华社发布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亿册印制任务胜利完成”的消息。这一消息随后在全国媒体上发表。在此前后，全国还“掀起了学习毛选五卷的高潮”。在 1977 年高考之前，《毛选》第五卷就已经印刷完毕，又怎么会与高考试卷的印刷起冲突呢？

笔者查到了中国轻工业发展的数据，1949 年，中国机制纸产量仅为 10.8 万吨，1952 年增长到 37.1 万吨，1957 年增长到 91.3 万吨，1965 年增长到 173 万吨，在“动乱”的文革十年中的 1975 年，纸产量也有 341 万吨，在 1978 年更是有 438.7 万吨（数据引自《中国造纸工业六十年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1977 年高考有 570 万人报考，假设每人消耗纸张 500g（约一百张 A4 纸的质量），也仅需不到三千吨纸，连 1977 年纸张产值的零头都不到，又何谈“经济低迷，纸张稀缺”呢？

《毛选》第五卷占用恢复高考所用的纸张是假，它被打入冷宫却是真的。《毛选》第五卷记录了毛主席在文革时期的各种文章和批示，其中不乏对六十年代修正主义回潮的深刻探讨，我们的总设计师怎么会容忍对自己最不利的真屠龙术为世人所知晓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再也没有印刷新版，我们目前能看到的，都是民间整理版——譬如静火版和赤旗版，以及少数《毛选》第五卷的初版。1979 年之后，《毛选》的印刷和发行量也被有意无意地压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毛选》甚至处在了实际上的“禁书”之列。

说回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资本控制了文化娱乐的方方面面，所有的文娱产品都是资本家赚钱的工具——他们才不会去宣扬什么艺术，能赚钱的，能帮他们洗钱的，哪怕是个哑巴，资本家也能将其包装成知名歌唱家；哪怕是个瘸子，资本家也能让他成为舞蹈大师；哪怕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资本家也能把他变成妖艳的女星。这一点，同志们有目共睹，笔者不再赘述。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作为党的嘴巴，它大概是不会忌惮什么资产阶级的威胁吧？可事实上呢？

> 正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奋斗，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推动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奋斗与拼搏，仍将是我们这个快速前进社会的主题词。而 996 的讨论则启示我们：未来中国的活力，将来自于快乐地去劳动，让一切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
>
> ——《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评论：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 996》

《人民日报》这篇避重就轻的文章，看上去是为工人说话，却对阶级矛盾闭口不谈，对于九九六这样已经严重违反《劳动法》的工作方式的罪恶性也只字不提。其实问题已经很简单了，这个国家最多的是工农，这个党的执政基础也是工农，这片山河是由工农打下来的，这个社会的所有财富都是工农创造的，而工农的权利却得不到保障，连党报都不敢于直视问题，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剥削阶级已经渗透到了党的核心中。

修正主义政府最喜欢钳制人民的思想，因为反动派要使自己的统治稳固，就要削弱无产阶级的力量，首先就要从思想上下手。与西方那套利诱的糖衣炮弹式的改良主义模式不同，中国的修正主义政府有着先天的优势——他们可以公开宣称，我们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我们国情特殊，要施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他们的做法与西方一样，分裂无产阶级，让全社会都歧视无产阶级，随后便可以粉饰太平了。

对于后者，我们要尤其防备。反动派最好的手段就是污名化阶级斗争，把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决策说成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马克思早就告诉了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和不公存在一天，阶级斗争就要存在一天。反动派还喜欢污蔑共产主义，以宫笑角，把共产主义说成“只是人类的理想”，大肆宣扬“由于人性自私，所以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人性的自私 ，广大无产阶级劳动者才要起来革资产阶级的命，沐猴而冠的资产阶级的走狗们把这一套玩得很好，我们的人民也大多相信了他们的鬼话。

当然，分裂无产阶级最好的手段，还是利诱。制造一批“工人贵族”，让他们自以为自己成为了“中产阶级”“精英阶级”，从而让他们与自己的阶级弟兄对立，倒向剥削者，成为工贼。这是反动派的一贯做法。

对于无法收买的无产阶级，就要通过社会文化和思想的潜移默化来改变了。首先要污名化无产阶级，污名化工农，还要污名化中国共产党。什么是工人？现在我们一说起工人，人们就想起农民工，想起肮脏的车间工人，想起“弱势群体”。真是可笑，工人是“工作的人”，富士康生产线上的工人是工人，管理层的白领就不是工人？设计师、科学家、工程师就不是工人？技术工人和文职经理就不是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出卖劳动力而产生价值，就是工人。如果觉得工人农民低贱，那就是中了资产阶级的诡计。

抹黑中国共产党，尤其是 1921 年到 1979 年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出的力简直比帝国主义势力还多。他们尤其要让人们相信，民国有着“黄金十年”，中共的胜利是因为“不抗日”，解放战争是“内战”，还要把中共渲染成土老帽的样子，把中共说成是“农民起义军”。真应该让袁世凯看看，什么才叫复古逆流！无耻之尤！

如果说政府在上述思想阵地的作为属于无能的话，那么在对于青少年的马列主义教育上，修正主义政府的行为简直是愚蠢。

在课本上，他们似乎刻意把马列毛主义写得十分枯燥，每一处塞满了着官话和套话，好像恨不得告诉学生：*我们在控制你们的思想，你们不要相信我们的话*。学生们都是有思考的，但很容易误入歧途，看见满书的教条，看见满目的官僚主义，谁都会觉得自己正在被洗脑，转而就吃下了西方“民主自由”的糖衣炮弹。

在课外，对青少年思想上的教育主要由共青团承担。哈！“*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挂着“共产主义”的庞大组织，如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样名不副实。这个有一百年历史的，目前拥有八千万名团员的，曾在近代战乱时期为中国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伟大先锋队，在今天，你竟然在其中找不出几个会唱《国际歌》的团员！

佳士事件之后，广东共青团竟然发文公开指责维权的工人是“国外势力”。哈！不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境外势力嘛！甚至中共和中共青团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你们要不要一并打倒？共青团为虎作伥，会给青少年造成多大的影响？

修正主义政党要扛着红旗反红旗，首先就要剥夺掉人民手中唯物主义的剑。尤其要容忍所谓的“传统文化”回流，譬如在国外大力兴办“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和传统文化。这真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失败！我们自己都抛弃的东西，还期待着外国人感兴趣吗？孔子学院唯一的功绩就是给官僚们了一个往国外输送亲友、养着懒人的的机会。去马列毛，尤其要过分强调孔学的地位，说什么孔学“文化瑰宝”。看到今天这幅光景，孔夫子恐怕也要在地下叹息：都两千年了，他们还把我一个生活在奴隶社会的古人的剥削思想奉作金规玉律！

然后就要动用唯心的英雄史观来解释历史了，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把个别杰出人物夸大为历史的主宰者。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个人崇拜，这在习近平当任后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毛主席向来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他拒绝把自己印在人民币上，反对把大街小巷涂满语录和画像，反对佩戴带有自己头像的徽章，尤其反对保存自己的遗体。早在 1956 年，主席就签署了自己死后火化的文书。

要怎么样才能彻底地羞辱一个共产党人呢？要在他死后，把他的财产剥夺，把他的纲领废除，把他的家人囚禁；要把他的著作融成纸浆，把他的头像印在人民币上，把个人崇拜的罪名狠狠地扣在他的头上；这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用福尔马林把他做成一尊神像，把他最心爱的红旗和他的遗体一起永远地放在冰冷的水晶棺材里，让他死不瞑目。接着，要指着这尊神像，说这是上帝，而自己是耶稣，让好不容易站起来的人民对着他们屈膝下跪！

习近平对于个人崇拜，做了什么呢？邓小平恐怕还有点廉耻，十分“谦虚”地自称是“人民的儿子”，而习近平竟然放任人民管他叫“爸爸”了。若我们的人民管马云叫“爸爸”，管王思聪叫“老公”，还可以解释为拜金，那么管一个红二代叫“爸爸”，那无非是称其为天子，尊其为天下百姓的“衣食父母”，好一个封建帝王！

所谓的修宪，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改为“无限”，并且获得了可笑的“全票通过”。哈！我们的习总书记是多么受百官爱戴！这一点，伟大的先锋队队长做的显然比袁世凯要好。

习近平“同志”又有什么革命性呢？不错，他玩弄文墨的手段倒是很高超，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所有矛盾——所有看得见的，尤其是阶级矛盾，概括成了不痛不痒的三个字：“新常态”！丰功伟绩！伟大至极！尤其要成为新时代的接班人，发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彻彻底底地将阶级斗争打入冷宫。

为什么要掩盖社会矛盾？为什么要淡化阶级矛盾？为什么要污蔑阶级斗争？这几点，毛主席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分别引自 1976 年 3 月 10 日、5 月 16 日《人民日报》

修正主义政府尤其害怕革命。请同志们不要忘记，共产党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政党，只要共产主义一天不实现，它就一直是革命党。即使从地下党变成执政党，也不能沉迷享乐，忘记革命。倘若忘记革命，只会粉饰太平，只会“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只能说明党已经开始享受革命果实了，已经成为腐朽的统治阶级的工具了。

很遗憾，我们党已经成为这样腐朽的党了。大量资产阶级和特权阶级掌握着党的统治地位，他们怎么会愿意自己窃取的社会财富和权利被底层人民夺回去呢？他们只好掩盖阶级矛盾，让人民相信，阶级斗争是对无产阶级不利的——尤其要宣扬，资产阶级是统治者，你们永远不可能翻身，用威逼利诱欺骗无产者，打压人民群众的斗争自信心。

相比于六十年代的修正主义回潮，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了。不仅无产阶级先锋队失去了革命性，连广大劳动群众也在他们的蛊惑下丧失了革命热情。新的大山把人民压着，气都喘不过来，还怎么造反呢？针对这些问题，部分改良主义者——尤其是所谓的“火炬党”“保皇派”，认为应该暂时无视矛盾，尤其要继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笔者甚觉得可笑，他们所谓的“革命理论”，无非只是把党中央的官话重复一遍罢了——这就好比农民起义军拿着皇帝的圣旨起义。这与陈独秀希望汪精卫帮助共产党又有什么两样呢？

为什么要革命？这一点，毛主席也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打倒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是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

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

——毛泽东：转引自《与毛远新谈话记录》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毛泽东：转引自 197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

走在修正主义之路上的中国共产党，尤其喜欢宣扬唯心的所谓“共产党万岁”的可笑理论。当然，“万岁”还是可以喊的，人民可以喊，共产党人却不能喊。人民喊“万岁”，多是发自内心的。在五十年代，人民喊“共产党万岁”，是因为共产党把四万万农民从地主的枷锁下解放；六十年，人民喊“共产党万岁”，是因为共产党初步建设了现代工业，造出了两弹一星，让帝国主义势力不敢侵略；七十年代，人民喊“共产党万岁”，是因为毛主席带领无产阶级劳动者与修正主义斗争。进入二十一世纪，修正主义的路线已经走了四十年，工人维权都要被镇压，人民凭什么要喊“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对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一切党、政府、国家，都是阶级统治的机器或者这个机器上的零件。零件锈掉了，换了便是；机器坏掉了，修不动再换一台便是。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而不是统治人民的阶级压迫的工具。

苏联是什么时候亡国的？是 1991 年那个寒冷的冬天吗？不，自 1968 年赫鲁晓夫镇压工人运动之后，苏联就已经亡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基础，失去了自己的本心，失去了革命的本质。之后的二十三年，不过是这个列宁和斯大林留下来的伟大国家在拖着残破的身躯喘息罢了。

我们的国家又何尝不是呢？改革开放不就是踏着无数无产阶级劳动者的躯体过来的吗？真是分得清利害！为了给资本家挪位子，杀几个小小的工人简直是不足挂齿！大下岗时吊死在工厂门头的失业工人，富士康事件跳楼的死者，被逼无奈开胸验肺的张海超，遭到了军警镇压的佳士维权者……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中国共产党正在——甚至说已经失去了它的执政基础。

一个背叛了革命的党，对于毛主席来说是毁不足惜的。

总之，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第 406 页

同志们，为伟大的理想而战斗吧！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地火阵线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日

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永远擎起

——对于文革史研究的必要性以及文革史对现实社会实践指导意义的讨论

敬原

史学界界定的 1966-1976 年的文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是这样革命中毛主席领导人民群众反对官僚特权政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一次生动伟大的社会实践和革命。这个时期波动极大，研究课题也极其深刻广阔，研究方向也难以把握。但正是这种复杂性，却并不能掩盖文革时期毛主席领导号召人民进行反帝防修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探索和实践的光辉，而深入研究学习文革史更有利于指导当前人民反对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种蒙蔽行径以深刻的启示。

“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我们都知道，现今劳资纠纷，都要走所谓“法律程序”，以资产阶级的法律来要求无产阶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事情，前不久的被判处罚赔偿 3.8 万的工人事件不是已经说的很明白了吗？？“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是贾谊反对秦皇焚书的，但是，史实及唯物史观是我们正确认识到，黔首并非秦皇，而正是开历史倒车的孔老二之流！孔老二之流提出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反动纲领，真是好一个“礼”！果然披着“仁义道德”的画皮，干着反革命的勾当。什么是“礼”？奴隶封建之礼，压迫人民，反对工商业与新兴产业发展的“礼”？如此之礼，如今又被修正主义集团高高挂起，在世界处处宣传者所谓的“仁义道德”，什么“克己复礼”。不讲政治，企图以封建剥削阶级压迫劳动群众创造出所谓假和谐来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样的伪“仁义道德”，在“豫章书院”事件中不都是血淋淋的事实吗？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没有这些，社会主义都是空话，白话，都是不牢靠的。

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草根”与“特权”的斗争，说白了，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造反派和以刘邓为首的官僚特权阶层的压迫阶级的斗争。毛主席在建国后各级国家机关由革命而被刘邓的现在这样路线带偏以后出现腐化的时候，“冒天下之大不讳”，毅然反对一切官僚特权，以致在他逝世以后，被各种污名化，现在又将他化为“无害的神像”。看看，剥削阶级的嘴脸总是厚颜无耻的，现在看来，我们盖饭对谁，支持谁，而有没有必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呢？

敬原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改开真提高了经济?

第三明

我们都知道，我们可恨的敌人—特色当局，在最近大肆吹捧改开带来的经济，他们最喜欢拿 GDP 说话，我们今天就来打破他们的谎言。

首先，GDP 的算法，我们要了解，通俗的说，GDP 是这样算的：我买你一个东西 5 元钱，然后 GDP 就提高了 5 元钱，就这概念，但地下交易，黑帮交易不计入 GDP 算法之类，如果算了地下交易，黑帮交易，那中国 GDP 就马上超美（笑）

为什么中国 GDP 会飞速发展？在我看来有两个原因

一．我们“伟大”的祖国的贫富差距极度不平衡（据调查，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 0.62），有的人拥有上万亿资产（比如一个坐轮椅的），而有的人连存款都没有，富人拥有买贵的的实力，而他们大多也都买贵的，这样对 GDP 的贡献就很大了。

二．我们的祖国拥有巨大的人口，我们按家庭数量来算，总共有 4.3 亿户家庭，每天都要买食物吃，假设每天需要的食物要付的钱是 60 元，算下来等于 2.58e+10 元，哦!你看，每天我们就贡献了这么多 GDP。

三．关于人均家庭资产：我们在一也说了，中国有极端不平衡的贫富差距，我们就拿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先生的一个说辞来做参照物，中国有 17 家万亿家庭，有 50 家千亿家庭，这么算下来，他们是实打实的主力军啊，按平均的算法，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四．关于工资增长：小粉红说：“我们工资涨了啊。”你们看这言论多“可爱”，完美的避开了物价。地区发展，也是极度不平衡的，我这里一个月 2000 元工资活得下去，而其他发达地区，2000 元可能不算钱。我们接着说物价，因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很多地方物价也不同，但中国各省，无产者的工资减去生活资料剩下的钱算下来都差不多，都所剩无几。接着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资本家要涨工资，他们涨工资主要有这两个原因：1.物价变化 2.无产者给自己带来了多少剩余价值。第一点我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第二点，我们详细说明一下。在生活中，我们都遇到过这种情况，让你多多干活，给你涨工资，我们大多关注点在涨工资，而没看到让你多多干活。如果我们干活多，我们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多，同时资产者可以从中吸取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这时候给你涨点微不足道的工资对它没什么影响，反而刺激了你生产的积极性，这样就可以给它带来更多的钱。那么这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是否相同？答案是完全不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前提是生产资料是公有制的，我干活都是为自己，为社会的，这样才是真正的多干多得。但资本主义社会就不一样了，无产者干的多，但得的终究比不过资产者得的，而资产者干的比无产者要少很多，这样就完全不是多干多得了。

五. 真的是改开让我们吃饱饭了？粉红经常说："没改开你们都吃不饱饭。"多么可笑的言论啊。首先，毛时期就吃得饱饭，初期是因为民国留下的基础，完全没用，从零开始，而大跃进则是因为某两位神秘人物。粉红又拿袁隆平先生说话，他们认为袁隆平能成功是因为改开。然而袁隆平研究成功，和改开没用半毛钱关系，他从文革时期就开始研究了。而中国又是粮食进口大国，这就说明，改开并没有让中国完全自给自足的吃饱饭。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改革开放非但没有让人民富足，反而让人民过得更苦了，看看现在吧，教育费，生活费，房价……那个不是现在生活苦的证据呢？事实胜于雄辩，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可粉红们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接着我们来谈谈为什么中特帝成为了新兴帝国主义。首先就是其的宣传。其宣传的大体分五种：努力神教，儒家，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神教与儒家的核心目的就是要人民群众，让人民不想反抗。宣扬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为了加强凝聚力以及巩固自身的统治，特色社会主义同理。但最开始走向修正的时候，并不是拿这五大"法宝"，初期他们是拿资本主义腐化革命的人民群众的，后面有了一定条件，特色当局就准备走向帝国主义了，于是他们便开始使用了五大"法宝"。接着，特色当局其实根本不担心外国的资本输出，这也就是为什么初期特色当局没被外国资本给输出完了的原因，赵家人是可以随意控制的，他们分内外网，一是为了藏一些历史真相，二防止国内自由化（外网抹黑毛的很多毛，特色当局把毛变成了神像，他们自然要利用这座神像）特色当局控制外国资本输出，还有一项案例，就是谷歌推出中国，在 2010 年，在中国，特色当局开了场批斗大会，就是批斗谷歌，很黄很暴力就是出自这场批斗大会。从这就可以说明，特色可以随意控制外网资本输出，要么民族主义控制（如不用华为你就是卖国贼，虽然这是粉红说的，但这也是特色当局长期以来民族主义宣传得到的）要么加大关税（如贸易战等）方法对于特色当局来说，多了去了。特色资本集团垄断，在马云创业那时候是没有形成的，因为特色当局的控制资本输出，马云得以抄袭 eBay，于是就起来了，形成了网络市场的垄断。特色当局还拿着一共的遗产呢。

以上就是本文全部内容，若有不足，欢迎补充，若有错误，欢迎批判。

第三明

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日

林夕的娃娃间

这世界太过诡异，我竟也无法看清“正常”和“不正常”了。

或许人都有些独特的癖好，我且不论其成因。姑且认为总有一部分人是喜好自残的吧，但是花样之反对指令我睁目而发不出一声。

喜欢穿乳胶衣，或许还可接受；假定自己是机器人，似乎也并无什么奇怪之处；静止不动，确实很像打坐，但人类的智慧是无穷尽的，以我短浅之见实在无法窥见里头的阴寒啊！

全身身着乳胶衣，被脱去全身的毛发，只在头套上留几个维系生命之线的细孔；不休不眠，以机器人般的定力一动不动的站上一晚或一宿；整日只能已被拟定好的日程表进行活动；身体完全由“主人”的命令掌控，包括下体供“主人”“使用”的拉链…如此之人——女人，甚至还有女孩竟足足有六人！

“她们是自愿的。”
“这不过是稍奇怪些的小众爱好。”
“只是别人圈子里的事，很正常。”
……

真是荒唐的“正常”！难道所谓的“自愿”，就是可掩盖一切的法宝了？长达四年的“训练”，也可说是所谓的“自愿”？那“蓝鲸游戏”何罪之有？南派传销，何罪之有？如此扩大，巫医治死人无罪，你自愿来的。诈骗无罪，你自愿相信的。高利贷无罪，你自愿贷的……更何况“自愿”还是他们的“主人”的一面之词！

“小众”从来，也无法成为粉饰罪恶的理由。好犯罪，便可说“小众爱好，包容包容。”吗？那我只有哂之了。自然，划圈子也无法改变其本质。

林夕的娃娃间是“伟大”的，其想了我们不敢想，还付诸于实践。其能力与勇气实在动人——大抵他是有这能力的。有大豪宅，可以说明其有六个“娃娃”的实力吗？有豪车，可以说明其有供养六个人的能力吗？有专用的定制乳胶，可以说明其有无条件命令她们的权力吗？有专门散布此的账号，可以说明其有“收集”六个“娃娃”的路子吗？和警察相识，举报还无用，文章离奇失踪，可以说明其有自在享受他的“小众娱乐”的“自由的天地”吗？可悲！他做到了！他将六个本就受过情感创伤的内向女性——甚至有未成年人。将他们改造成了物件！竟也可光明正大地向社会寻认同？我还有什么可说，只有睁目且无言了。

这正常吗？这可以正常吗？为何我能看见有人为此极力辩护的？不断的引入人性基于荒谬的观念，便可以将其无罪化？这可以说是文化百花齐放？可以说是社会包容万象？

地狱空荡荡，天堂已无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难道可以任由罪恶不断从眼前飞过而不在乎，深入生活而沉默认可吗？不！绝不是如此！但我们报了警，无果；发了文，消失。可是因如此，我们更不能冷眼旁观。我相信他终究无法一手遮天，我们是可以夺的正义的！

此景此事，到底因何而起？我们又怎去寻觅真、善、美呢？我只知道，邪恶是存在的……

……

林夕的娃娃间本人给出信息：

① 共养六个娃娃。

② 其中有未成年人。

③ 娃娃本身是经过些感情伤害且内向的女性，由他专门挑选。

④ 胶衣几乎全封闭，喂食通过摘下头套或用鼻饲管（用管子从呼吸道伸入胃部，喂流食）排泄在下方有拉链或用导尿管。

⑤ 之前着衣时长为 23.5h 每天，后来通过训练可长达三天或更久。

⑥ 对娃娃设定许多模式。可以站立不动不睡维持一晚上。

⑦ 对娃娃的性行为成为“使用”，并说其学机械叫床声。

⑧ 承认物化。

⑨ 训练达四年之久。

⑩ 有用锁链，笼子关的行为。

11 娃娃是穿乳胶的真人（曾发过视频，现难以找到）。

已知情报：

林夕的娃娃间在前几年就存在，后在微博上的一切话题被抹除。

19 年曾有人举报。（一九年七月份左右）

出没地点跨度大（带着娃娃（用行李箱装着）），且多。

举报未果。警察方面无动静，一段时间内几乎不可能找到任何有关信息。

后在外网活动，发布有关娃娃的图片，包括但不限于：锁链、被关在笼子中、供他“使用”，被装进真空箱……

5 月份景狗公众号发布有关文章。

5 月份景狗公众号被爆破。（其有一小号“青年爆破局”）

据文章称公安部门受理案件的相关消息消失。

哔哩哔哩在 5 月 22 日仅有五个视频，全为 5 月 22 日投稿。剧一 up 描述，稿件有被删除过。

知乎有部分相关信息，可查。

对一些疑问的说明：

Q：万一只是作秀呢？

A：希望仅是作秀，但外网长达三百天的持续作戏；实在太勤奋。但为何微博信息全被处理，警察不受理，无任何人员试图说明情况，举报其得人反而被爆？但作秀目的似乎有：卖胶衣或其他。

Q：警察都办不到，我们还能怎么办？

A：或许会在网上清楚一些消息，但我们不是什么也干不了。可以告知媒体，向有关部门举报，人数多了更容易被受理；备份相关信息防止被删等。

编者注：

该文不涉及冲塔部分，仅是点到为止，因此可以用于宣传中第一步比较安全的使对方初步认识到特色当局的黑暗（当然，可以手动向其原因是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引导）。另外，还可以比较方便的转到其他特色管控的平台。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当代中国阶级现状

咖啡助眠

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大工业化进程，在蔓延至全球的过程中不断地摧毁着这个世界上大部分陈旧的国家和制度，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下。于是，全世界的阶级情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一对双胞胎成为了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时至今日，曾经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如今逐渐式微，意识形态的碰撞中社会主义也落于下风，无产者的同盟已经近乎破裂，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却在不断地发展自身，用更加隐秘、复杂、全方位的手段去剥削和分化无产阶级，妄图让自己的统治千秋万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迈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新世界已经要比马克思的时代更加复杂了。全球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潮，阶级矛盾被种种繁杂的社会现象所掩盖了，新的暴力革命的基础也尚未孕育。当然，不变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无止境的剥削和压迫。

同时，身在此山中的我们也无法准确地预言变革会在何时来到。或许矛盾其实已经濒临爆发，全面战斗就在明天。又或许我们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期，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等到很久之后。总之，在今天仍然坚持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理念的人，也必须暂时忍让。

但是，这是革命的妥协，而不是反革命的妥协。我们暂时的妥协不意味着自欺欺人，也不意味着放弃努力。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认清楚当代中国的阶级状况。认清这些，不是为了立刻带领被剥削阶级起来革命，而是为了更好地看清现实，通过理论和实际的相结合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至少要将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火种保存下来，并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来捍卫这份理想。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经济、文化、思想、政治上的差异与日俱增，阶级内部的分化也日益凸显，不搞清楚今天的阶级状况，就不能看清楚今天的经济与政治情况。

一、广大的底层无产阶级

当今中国最底层的群体是广大文化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人、服务人员等等，受困于出身和家庭环境，他们之中甚至有很多人连义务教育都无法完成，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体力劳动。

这个底层群体中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大量的农民工。

目前，中国农民工数量就有大约三亿，根据 2017 年的统计，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民工比例只有三成。他们主要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工作。建筑业、制造业、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等行业的基层工作大部分都是他们担任的。从年龄层次来看，这部分群体当中较为年轻的人群主要聚集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厂仔、厂妹、服务员、外卖小哥等等是他们常见的称呼。而另外一些年龄较大的人群，由于大部分几乎没有什么技术能力，往往只能从事这些行业中最底层的工作，比如工地民工、小摊小贩、修理工、保洁、流水线工人等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8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 年我国共有农民工约 **2.88 亿人**，比上年增长 0.6%。乡内就近就业农民工约 1.16 亿人，外出就业农民工约 1.73 亿人，外出就业中进城农民工约 **1.35 亿人**。从地区来看，输出农民工和输入农民工的主力地区都是东部较发达地区，但是贡献增长的主力地区是西部地区。在年龄构成上，30 岁以下的工人占比逐年降低，从 2014 年的 33.7%下降到了 2018 年的 27.6%；50 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逐年提高，2014 年为 17.1%，2018 年达到了 **22.4%**。这体现了农民工群体一个结构性的变化：新生农民工数量逐渐降低。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50.5%，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为 49.1%。

在另外一方面，在从事农业生产的第一产业部门里，底层无产阶级的代表则主要是一部分农村的自耕农、小规模的自营农户和农业企业的底层农业工人。

旧社会时代，由于小农经济还未破产，自耕农占有一点土地的所有权，也存在一定的生产剩余，他们被毛泽东同志归类于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而在当代工业化的社会，土地这一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属于集体所有，同时自耕农的那点生产剩余甚至连购买基本生存保障品都不一定足够。所以这些群体现在应当视为无产阶级。自耕农当中，最底层的群体以滞留在农村的老龄人口和残弱人口为主，他们的情况往往是子女外出打工，自己则在家务农，耕种自己所分配到的土地。由于他们主要采用独自耕作的小农生产方式，经济收益不高，忙碌一年的收获甚至可能比不上打工一个月的收入。这部分群体和农民工的关系十分紧密，也常常相互转化。在家庭经济状况较为困难的时候，甚至有些年龄较大的农村居民也要被迫外出务工。

而对于农业工人和承包土地较多、以自营农业为生的农户而言，情况则稍微好一点。截止 2018 年，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率已经超过 67%，主粮机械化率超过了 80%，其中大部分是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农垦农场。为这一产业部门贡献出劳动力的主力军就是农业工人，他们的主要收入是农场和农业企业的工资，在收入水平上比自耕农要好不少。但是这部分人群往往是由于国家对于一部分地区农业的规划而成为农业工人的，流动性较低。我认为，随着未来国家对于农业集体化的推动，会有一部分农民工、自耕农和自营农户得以成为这样的农业工人。但是，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也就意味着不需要那么多农业人口，未来也注定要有许多农民被迫与土地剥离，进入城市成为工人，接受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剥削。

另外，对于大部分规模有限、无法形成行业联合的自营农户来说，他们的收入依赖于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牲畜的销售，其中主要是经济作物，粮食作物和牲畜的生产主力都是国有和集体农场了。这些种植户们直接接触的下游是国有或者私有的收购商。很多作物的收购价格都是国家指导价，这些价格一般并不高，近几年也有一部分经济作物开始准备实行市场化定价。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其经济状况往往比较脆弱，很容易收到行情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前几年农产品大量滞销的事例和这几年兴起的地方官员网络“带货”的情况，都是这一问题的表现。这是由于他们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弱势地位导致的，想要根本地改变这一状况，可能只有通过规模化农业企业向上游延伸，将原材料生产部门也纳入其中才能解决。

我们可以从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中窥见一斑，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截止 2016 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共有 **3.14 亿人**，这个群体和农民工群体有部分重叠，纯粹进行农业生产的人数应该没有这么多。其中，55 岁以上的人员比例达到了 **33.6%**，这个比例也要比农民工群体高。从事种植业的人员占比最高，达到了 92.9%。在这 3.14 亿人中，具有较大农业经营规模、以商品化经营为主的规模农业经营户所包含的经营人员（包括本户生产经营人员及雇佣人员）数量只有 1289 万人，这 1289 万人的结构和全部农业经营人员的结构有较大差异。年龄在 55 岁以上的比例下降到了 20.7%，种植业从业比例则下降到了 67.7%，排第二的畜牧业比例为 21.3%。

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业产业经营人员和农业工人在第一产业的无产阶级群体中的比例其实十分低。这个无产阶级群体的主要组成人员还是自耕农和自营农户，尤其是种植户。而他们则主要来源于相对落后地区和乡村地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较差，社会保障并没有全面覆盖他们，其生活往往依赖于微薄和单一的农业作物销售收入。

未来农业生产如果全面走向机械化、集体化、工业化，自耕农和自营农户就会被逐渐消灭。随着我国农业人均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或许会在短期有所提升，但是长期来看会呈现一个下降趋势，只有农业工人的数量会增加。那么，大部分无法转变为农业工人的自耕农和自营农户，未来的出路就是像现在的农民工一样，转化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成为标准的无产阶级。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矛盾和全球矛盾逐渐激烈的情况下，我们的国家是否能够在国内和国外找到足够的市场来出售商品，好创造足够的就业供给呢？这将会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又换句话说，在没有足够的就业供给时，国家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不会急速地推动农业生产全面机械化、集体化、工业化。

总体而言，这部分包含了农民工、贫穷自耕农和小型自营农户的底层无产阶级群体的数量可能在 **3 到 4 亿**，从数量上看很可能占到了整个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60 周岁）的 **40%**左右。这个数据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并不官方的调查，不一定准确。另外，他们中还有一部分人超过或者不到劳动年龄却必须劳动，比如我的爷爷在 70 岁的时候仍然会参与种地。

底层无产阶级群体们一方面为整个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原材料和基础产品，另一方面又为社会的大量基础产业提供了主要的劳动力，他们所能获得的回报却是整个社会中最少的，甚至连社会整体发展的成果也很难享受到。这就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避免的，身处弱势一方的他们所能创造出来的“价值”在市场交换中就是这么微弱。这也注定了除了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重新让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以外，所有其它的方法都只能暂时地、片面地缓解他们的痛苦，而无法解决这一根本矛盾。

这部分群体中往往充满了对生存问题的困惑和痛苦，他们缺少完整的教育，无法理解自身的状况，不得不面对各方面的压迫，却又缺乏话语权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合理方式，很容易出现极端情绪和（身体上和精神上）互相伤害的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媒体上常常看到一些的恶性犯罪事件多发生于相对落后地区和底层群体中。

这部分群体的劳动回报最低、受剥削程度最高。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他们所受到的压迫都是最大的。然而，可悲的是，虽然底层无产阶级这个群体十分庞大，但是他们却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关心。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和你的家庭是一个具有较高学历（比如大专以上）和稳定工作的城镇居民家庭，除非你是相关行业的直接参与者（比如工头、监工、领班、车间主任等），你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会和这个群体有普遍的联系。他们甚至不存在于我们这些“文明人士”的生活里，我们只可能在媒体和网络上了解他们，而这样的了解也是片面的、被加工过的。在看到他们的悲惨时，作为文明人士的我们往往愿意施舍一些没有成本的同情。在对他们进行具体接触和评价的时候，文明人士们却又往往会习以为常地鄙夷和厌恶他们的无知、落后、一切丑陋的行为。虽然嘴上不会直接说鄙视穷人，但是对贫穷和不平等所派生出的这些丑恶却可以大肆抨击，这甚至成为了国内网络的某种政治正确。但是，造就大部分丑陋行为的根本原因，正是整个不平等的社会，是吸了他们的血从而让我们这些文明人士享受到丰厚利益的剥削制度。

二、依附性更高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

由于我国现代的地区发展差距和产业发展差距，这部分群体的内部差异很大，主要是经济状况较好的城镇居民。他们在财务上的典型特征是大部分人具有一定资产，各项收入能够在覆盖生活保障的同时还有一定的剩余。而这个剩余的数量分布则较为广泛，可能每年有几万元，也可能有几十万（获得剩余更多的群体就可以逐渐积累为小资本家了）。他们中有较发达地区和较发达产业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中下层职工、普通公务员和基层干部、普通的自由职业者、一般技术人员、各类中小个体户等。

虽然同样不占有或者不稳定地占有极少的生产资料，但是这部分群体的受剥削程度比底层无产阶级低，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经济和政治上的压迫也较少。他们对现代经济体系的依附性也比过去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更高了，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虽然贡献出了劳动力价值，却收到了一定的回报，这个回报足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国家快速现代化的成果，越是处于发达地区和发达产业的人就越是如此。

但他们往往很难认识到，这个现代化的成果大部分来自于国家资本对广大底层劳动人民再加上他们自身生产剩余的剥削（如果觉得这个词不好听，那么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从个体的生产剩余到集中性资本的积累和转移过程）。这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只不过当时的资本积累和转移是国家层面为了发展而通过行政力量去进行的，而在今天，则掺杂了各类资本单纯为了自我增殖而进行的恶性剥削（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批判的）。

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劳动差别逐渐加大的情况下，这部分群体不仅仅数量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不小的增长，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也日趋增大。一个是所处产业位置上的差异。已经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让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和产业部门内部的差异也与日俱增。大部分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对自己不了解的、差不多等级的其它产业位置抱有一种轻视的态度。这一点严重影响了无产阶级的团结。

另一方面，则是认知上的差异。他们是社交媒体中主要的讨论参与者，我们常常谈论的基层民意，实际上是他们的思想表达。

由于缺乏政治权力，再加上消费主义的盛行，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的满足一般是他们的核心诉求。但是，对阶级身份和政治知识的缺乏，也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自身所处的环境并不明朗，具有同样核心诉求的这些人对于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认知甚至还极为对立。如果说底层无产者主要因为生存问题而困惑，那么他们则主要因为思想认知问题而混乱。在这个群体里，有的人十分爱国，有的人逢中必反，有的人坚持公有制，有的人希望私有化，有的人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的人要求平等公正。但是实际上，他们虽然常常对各类社会问题表现出关心，这些问题却常常正是他们所无法去影响和改变的。更无奈的是，虽然他们会表达出很多对立的意见，但是在真正的生活当中，对立的双方有可能遵循的是同样的行事逻辑和同样的追求。与其说他们的混乱是政治理念的分歧，倒不如说是信息认知上的差异。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会在一方面具备无产阶级的朴素意识，会痛恨社会的不公，另一方面则又混杂着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期望着自己能实现阶级上的跨越，享受到更多的剥削成果。然而，这种分裂性和不确定性注定是镜花水月。或许他们能在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安稳生存，但是一旦自身出现了阶级下滑，或者时代发生变化，阶级矛盾重新爆发，他们可能就要体会到巨大的痛苦，体会到底层无产者们一直忍受着的痛苦。

三、新式的小资产阶级（或称中产阶级）

在马克思的时代，小资产阶级指介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通常占有一小部分生产资料，一般既不受剥削也不剥削别人者，主要依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主要是医生、教师、工程师等知识分子。

那么，这个概念直接照搬到今天还可行吗？我认为不太可行，今天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极大的区别就是：整个社会化大生产已经裹挟了文明社会的一切，几乎没有人可以在这个不断细化的社会化大生产中独善其身，必须要参与到这个体系中来。医生被束缚在医院中，教师被束缚在学校中，律师被束缚在法律体系中。守着某个小产业，自己掌握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的那种日子已经在现代社会中一去不复返了。

很显然，今天的小资产阶级已经无法做到既不受剥削也不剥削别人了。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反而变为了虽然基本不占有生产资料或者占有小部分生产资料，却能够参与到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过程中，同时，他们大多还具有劳动者的身份，贡献出一定的劳动价值，最后再分享一小部分上层阶级赐予的剥削成果。

他们的数量相对较少，主要有高级职业经理人、企业高管、行业高端人才等。他们的主要特征是已经脱离了生存需求，拥有着所谓的"事业"，对于自身的地位和阶级情况有比较清晰的认知。

和依附性较强的无产、半无产者一样，小资产阶级们之间也会有矛盾，会具有很多不同的政治理念。但是，他们中的有些人并非是出于认知的混乱，而是由于其归属的资本的性质不同。吸附在自由经济和新兴经济上成长起来的人，在实践中就会支持扩大自由化；而吸附在垄断资本上的人，在实践中就会支持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垄断。

总之，不论他们的理念如何，他们最大的目的还是尽一切可能去积累资本，提升自己的阶级地位，这也就注定了这个群体会有很大可能是要去维护剥削制度的。时代和社会越稳固，他们就越会维护现有制度。只有在乱潮到来，小资产阶级普遍发生阶级下滑的时候，他们可能才会被迫地接受无产阶级的理念。

四、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兴起的资本家

这是一个在中国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主。单从数量上来看，他们控制着我国的大部分经济组织。根据国家统计，截止到2018 年初，民营企业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据，虽然很多人一直秉持着民营企业家需要屈从于官僚的观点，但是从数值上来看，无论我们承不承认，他们都已经是我国经济不可或缺、具有强大影响的一个群体了。民营企业家们控制的企业产生了我们国家 60%以上的商品价值。他们的足迹遍布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新兴产业等各类产业，近年来国家更是要向他们逐步开放一些原本的垄断性产业。

这个群体也是实质上压榨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他们从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就在不断地用各种方式剥削劳动者。比如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国制造，在初期就是依赖廉价劳动力大量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完成原始积累的，与其说那时候是在“衬衫换飞机”，不如直接说是在用诱人的低价出售规模化的劳动力这个特殊的“商品”（反正根本上承担了成本的是无产阶级劳动者，国内外的资本只需要付出低微的工资）。再比如曾经让人触目惊心的黑煤窑、黑矿洞，都是资本控制之下他们的“杰作”。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地产企业、金融企业、互联网企业等逐渐兴起，新兴资本家不断地提升着自己的高度，也在不断拓展新的剥削方式。到了今天，甚至就连 996 都被“人民资本家”称为福报了。

同时，这个群体不仅不遗余力地压迫劳动者，其内部竞争也十分激烈。一个人如果是依附于资本体系的小资产阶级，那么他可以不用考虑太多衣食住行的问题，而一个人如果是中小资本家，那他可能就要时时刻刻把自己的“生存问题”放在心上，即是否能够保持自己的阶级地位。在这个资本体系的内部当中，大资本会吸食中小资本，金融资本会吸食产业资本，国际资本会吸食民族资本。资本之间的绞杀也是血腥的，只不过流的最终还是无产阶级的血。总之，成为了资本的奴隶之后，每一个置身其中的资本家就都无法停止嗜血的脚步了，因为一旦停止，就意味着被资本抛弃，被其他资本家碾压过去。

如果说早期的民营企业主们要么是本身就背景深厚，要么是仰人鼻息、通过权力的恩赐来获得机会，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高新产业的白手起家或近乎白手起家者。而相对独立地创造出经济地位的他们，必然会要求获得相应的权力，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新兴资本家们可能会因为相互竞争而在经济利益上有所对立，但是他们一定会在要求增加政治权力和扩大自由这一点上保持高度一致。也因为他们的存在不容忽视，他们的国家不可能直接和公开地压制他们。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就强调了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在上升周期和国家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新兴资本家可以和官僚集团保持一致，共同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等到发展面临压力，经济滞缓的时候，都要寻求占有剩余价值的双方的根本矛盾就会凸显。官僚集团如果不想自取灭亡，就不可能无限制地剥削无产阶级。那么，他们就需要新兴资本家牺牲一部分利益，而新兴资本家们对此则不可能毫无怨言，他们只会更加渴望政治权力来保卫自己的利益。考虑到他们所追求的利益实际上是纯粹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真正的盟友可能是在外部，在那些试图改变中国体制的人当中。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官僚集团来说，群众则是他们控制新兴资本家最好的武器，通过自身“社会主义”的法统来调动群众，既能逼迫新兴资本家做出让步，阻挡他们前进的脚步，又能获得群众的更多支持。但是，如果未来的某个时期出现了较大的经济危机，同时官僚集团在权力上的优势也不够大，双方有可能爆发正面冲突。

六、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集团

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在当下社会，实行统治的明显不再是工人阶级了。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并没有像欧美国家一样由资本掌控一切。但是，先认真思考一下这几个问题：目前的社会中，拥有着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和权力，并借此支配大量生产资料的到底是什么群体？这些人是否已经成为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是否是因为其社会地位而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了？这个集团是否因其社会地位而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

想完这几个问题，那么答案应该呼之欲出了。是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实质上的一个统治阶级，一个新式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核心和利益代表就是现代化的官僚集团。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指出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旧的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指勾结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势力，掌握国家政权，垄断全国经济命脉的买办性的资产阶级。在那时，旧的官僚集团还具备明显的早期资产阶级特征：即为了扩张不择手段。因为对外投降和对内无节制的压迫，他们很快就被推翻了，被无产阶级及先锋队取而代之。

到了建国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逐渐稳定，新生的官僚集团也逐渐庞大了起来。毛主席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是，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由于逐步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原来的国有企业大量地资本化，新兴的私有资本不断涌现，官僚资产阶级也随之成长，官僚集团就像癌细胞一样扩散至了全国上下。

在讨论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集团之前，我们首先应当认识到一点：所谓的阶级，并非是一群“信徒”，他们并不是因为有着坚定的、虔诚的统一信仰而成为了一个集团，而是因为在一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下，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必然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获取利益。而这些使用相同方式的人，就自然地形成了同一个阶级。在封建社会，地主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租土地给贫农；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们都会不约而同地雇佣工人。本质上，他们都在使用压迫的手段剥削劳动者，这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某种神谕，也不是他们手上有同样的指引，而是身处这个位置的群体本能地、自发地使用了相同的方式。一个阶级在一开始诞生时只是社会生产关系上某个位置无意识的集合体，换句话说，他们是被这个位置所控制的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掌握了资本的人也被资本所掌握，必须去保证资本的增殖，不然就要被资本甩开。这就是资产阶级。

认识完阶级的根本特征，我们就应当明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并不是先有了政治理念，才有的相应行为。而往往是因为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才有了相应的行为和对应的政治理念。许多人把今天的很多问题归咎于过去个别人的恶行，那是错误和幼稚的看法，同样，认为依靠个别人就能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也是错误和幼稚的看法。

今天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处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区别在于，那些资本家的根本利益就是不断地获取利润来扩张自身所掌握的资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然要去剥削无产者。他们会用一切手段去分化、压迫无产者。同时，他们又必须给无产者一点生存空间和希望，以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被动摇。

而对于中国的新式官僚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资本的扩张，用比较优雅的话说，就是综合国力的提高。

他们并非是由个人来掌握资本，而是由整个集团来掌握资本。但是，由集团来掌握资本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会诞生出无产阶级的统治，只会导致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在以利润为导向，反映到国家政治层面，便是从地方政府到整个国家的资本化，是从上到下的经济增长导向。怎么可能既要求国家资本保持增长，又阻止工农阶级的剩余价值不被剥削走呢？

名义上，国家资本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但是，整个国家资本的实际掌控者实际上是通过政治和资本相结合来控制和支配生产资料的官僚集团（举例：前总理李鹏，儿子任煤矿大省山西省的省长，女儿任电力国企的负责人），按照所有制来看，官僚集团似乎并不是国有资本的所有者，这些生产资料有很大部分在名义上仍然是国有的，但没法否认的是，支配它们的只有这些官僚集团而已。所谓的贪腐，就是这些官僚集团在支配这些生产资料时，将部分资本和其收益流入了私人的口袋（私有化、受贿等就是表现形式）。短期来看，这个集团的资本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由个人继承，权力也不像封建国家那样完全世袭，这个集团和体制内部仍然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健康性（虽然这种流动几乎与底层无产阶级无关）。同时，这个集团还会不断地遏制内部腐败，因为它追求的是国家整体资本的增殖，而大量的内部腐败显然会损害这一点。但是，中国式官僚资产阶级既然追求的是国家整体资本的增殖，其在行为方式上就必然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有一个根本的相同点，那就是对大量无产阶级生产剩余的占有。

所以，无论某个作为个体的人有着怎样的思想认识和怎样的政治理念，一旦他有幸进入到这个统治阶级里，如果他想要存活下去，不被排挤出这个集团，那么他就必然要遵循这个阶级的行为方式，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从而也就成为了这个阶级的一份子。这就是阶级的可怕之处，它甚至不会在乎你是邪恶还是善良、是道德君子还是卑鄙小人，只要进入其中，哪怕你是一个圣人也会自发地遵从它的意志。

放到现实来看，某个官员即便十分清廉，一心为人民当家做主，他都不得不在主政一方时保障当地企业的发展，即保障资本的增殖。就算他是一个标准的道德君子，也不会改变工农阶级被剥削的命运，最多只能做出一些措施来降低工农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被压迫的程度而已。

整个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并不需要去思考今天的官僚集团里有多少好官和多少坏官，因为即便今天的官僚们人人都是海瑞也并不能改变国家资本在扩张时对底层无产者的剥削，毕竟，海瑞也是一心要维护大明统治的。如果只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和全面反腐而不设计经济基础的改革，那么最好的结果也只是让官僚集团改良一下，剔除其中有损国家利益的买办集团和投降主义者。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套说辞还能够支撑多久。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或许会面临以下的局面：有可能是所谓的生产力发展进入停滞；也有可能是我们取代了美国的位置，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那么在那个时候，国家资本是会停下增殖的脚步，转而对自我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是难以遏制其作为资本的根本特征，开始扩大剥削？如果是前者，人民十分支持，如果是后者，恐怕激烈的对抗就在所难免了。当然，“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到最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至于东风何时能再压倒西风，或许我们能够看到，或许要好几代人之后才能看到。

附图：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剩余的转移过程

<table>
<tr><td rowspan="5">↓ 占有生产剩余</td><td rowspan="3">资产阶级</td><td colspan="2">上层官僚集团</td></tr>
<tr><td rowspan="2">官僚资产阶级</td><td>大资本家</td></tr>
<tr><td>小资本家</td></tr>
<tr><td rowspan="2">无产阶级</td><td colspan="2">依附性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
中下层职员、基层公务员、中小个体户等</td></tr>
<tr><td colspan="2">底层无产阶级：底层工人、贫穷的自耕农、农户等</td></tr>
</table>

<table>
<tr><td>发达产业：
金融、网络、医药等高新技术和垄断行业</td><td>落后产业：
农业、加工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原材料产业等</td></tr>
<tr><td>发达地区：
沿海地区、省会、一线城市等</td><td>落后地区：
西部、山区、边远乡村等</td></tr>
<tr><td colspan="2">生产剩余转移
←</td></tr>
</table>

咖啡助眠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日

敬原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权利的讨论

敬原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就像列宁所说的“小生产者是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资本主义”一样。

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呢？那则取决于什么阶级掌握着政权。有些国家，明明存在着市场经济体系，明明还是私有化占主导，明明官僚主义还很严重，明明普通雇佣劳动阶级还没有话语权。可他偏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当然，还不忘加上“特色”二字。

首先，教育扮演着异化人的第一步。他们用资产阶级思想育人，用资产阶级精英选拔的方式淘汰人，用固化的思维模式“塑造”人，使学生成了书本的“努力”，脱离了生产。但是现在虽说大学生与大专生毕业后都是为人所剥削，但是这其中仍然分出了三六九等，而且整个社会的风向都是导向“只有上了大学才有出路”。一般的大专，并不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学校，而是被精英教育“淘汰”下来的一部分“差生”，而他们必然被上层抛弃，使他们的行为更加朝市井方向发展。这就是教育时人的异化。

在官僚特权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有一个拥有很大号召力的“党”和一个强大的暴力机关“政府”来共同主导的，加之以一个庞大完整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这就使整个社会固化。为什么会有“跳槽”，美其名曰“选择职业多样性”，不过就是社会生产力快速提升，二自己的能力难以满足高压的监工模式导致难以继续在旧有环境下工作，从而更换工作场所，接受另一家公司的剥削。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有选择接受哪家公司剥削的权力，却没有选择不被剥削的权力”。

资本主义社会，从教育到社会就业，都用市场这个无形镣铐把你牢牢锁住，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就提出“消灭私有制”和建造“无产阶级专政”了。

如此多年过去了，真正的马恩列的哲学更新升级到毛时代便结束了。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理论创新中，究竟是工团主义、世界革命好，还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好？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杆秤。我们当前的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至于斗争表现为何种形式，这都是需要鲜血和生命来诠释的，我也不好多加评论。

不过，毛主席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反官僚主义山头主义等反动变质作风的斗争经验仍然值得我们研究、探讨和学习。从五十年代反腐败、反右倾，到文革中集中反修防修，选择接班人，等等斗争实践中，还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学习。

那么，无产阶级需要如何的斗争呢？

为的可不是提高什么“劳动力素质”来满足资本家剥削，而是使人民聪明，为解放自己做好充足的准备，准备反对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帝国主义，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以满足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这种性质的生产则是掌握在劳动人民自己手中的前提下，进行完全为劳动人民自己的生产。自己所利用的社会生产，是劳动人民在获得真正的解放后进行的无剥削的，资源的积极地生产。

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一定要正确。应该让全体人民明报，只要搞修正主义，就存在亡国的危险，存在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危险，就存在剥削阶级重新掌权，欺压人民的危险。

而这些危险，都是已经发生且仍在发生着的，这是改开的“顽毒”。

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仍有较大的活力，他仍然持续释放着它残存的但依然强大的能量。但在几十年内必将爆发新的战争，而在那时候，无产阶级必将夺取属于自己的政权！必将雄立于世界！

敬原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四日

对版权的一些探讨

慕华

版权是什么？

版权亦称"著作权"。符号：©。指作者或其他人(包括法人）依法对某一著作物享受的权利。根据规定，作者享受下列权利：（1）以本名、化名或以不署名的方式发表作品；(2)保护作品的完整性；(3) 修改已经发表的作品；(4) 因观点改变或其他正当理由声明收回已经发表的作品，但应适当赔偿出版单位损失；(5) 通过合法途径，以出版、复制、播放、表演、展览、摄制片、翻译或改编等形式使用作品；(6) 因他人使用作品而获得经济报酬。上述权利受到侵犯，作者或其他版权所有者有权要求停止侵权行为和赔偿损失。

这是资产阶级对版权的解释。简化一下，就是：被资本主义法律承认的，对某一种著作物所拥有的复制权利的合法所有权。即对某种著作物的私有权力。并且资本主义法律能够保护其私有权不被侵犯。那末，版权的实质就很好理解了，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知识领域上的体现。

为什么这种特殊的机制才能私有化版权呢？

首先，要对知识进行分析。显然，知识这种生产资料也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例如前人的知识或计算机或什么东西）的结合产生的。其的生产成本的规律也不例外，也是生产其所需的社会平均劳动小时。但是其生产出来的产品——知识呢？

这里就是知识和普通生产资料不同的地方了。首先，知识并不是像普通的生产资料那样，表现为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是体现为一种抽象化的东西（当然，在现实中一般会有纸张或硬盘或其他什么东西作承载。另外，还会有学习成本。但是这些东西只能说是知识的外壳，并不是知识本身），这种抽象化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成本和复制成本是完全不对等的。这就是知识的可复制/延展性。由于这种特性，知识这种生产资料一旦生产出来便几乎成为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可以说，知识天生就是为公有制而服务的。

这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显然是好的。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呢？知识生产出来，然后直接全社会使用是不利于资本家的资本增值最大化的。资本家提升科技水平的原动力即是为了其在同一劳动力水平下，生产出的商品的价值能够高于其他资本家的生产。如果所有资本家的生产都获得了同样的生产科技（知识）。那末资本家雇佣知识分子生产知识的增值是显然不是最大化的。于是，就出现了专利。专利也是使知识私有化，实际上和版权基本是一样的。或者在一些情况下，资本家反而会利用知识的易复制性，会把知识售卖给其他资本家，给予其使用权或者其他什么权。这是为了增值最大化。或者有些知识也可能几乎无条件的分发给所有人，比如资产阶级政府为了愚化无产阶级搞地什么民族主义宣传。

因为知识不做法律约束就基本可以说是公有。因此要使这些资产阶级的利益最大化需要什么呢？就需要知识私有制的法律。所以，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议会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就通过了这种“保护版权“的法律。

版权和类似其的东西有哪些？

实际上，对易复制性的物进行私有制的东西都能套到上面这些问题中，例如专利（这是对于科学技术等易复制性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工具）、版权（这是对于各种知识作品的）、知识产权（是对于文字作品的）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不是知识的生产者掌握版权吗？

资产阶级把版权、私有制这些东西捧得至高无上，似乎是必定存在的东西。他们以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话术来蛊惑无产阶级。他们说：“作者自己掌握版权，作者独立于公司，公司和作者平等“。实际上，在现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知识生产者一般是类似雇佣的知识工人贵族阶层的存在。或者是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过渡的中间形态——雇佣合同的作者（可以类比成上世纪的小资产阶级即将转向无产阶级的“合同制”的半独立的农民）。实际上已经基本不是知识生产者占有版权了，而是资产阶级占有版权。

应当如何看待“阅文事件”？

阅文事件是由于阅文公司修改对作者的雇佣合同，将原属于作者的版权夺取到阅文公司的资本集团中。相当于直接将原属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过渡阶段的网文作者的生产资料转到资产阶级手中，并使其（网文作者）变为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当然，属于工人贵族阶层）。显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事是必然发生的，是生产的社会化的结果。但是其或多或少的激起了网文作者阶层对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吸收网文作者并帮助其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另外，客观来看，该事件也的确促进了大众对中特当局的阶级性质和“自由资本”的认识的了解。

目前有哪些正在向资本主义版权作斗争？

Copyleft 运动、自由软件运动（例如 GPL）、创作共享计划（例如 CC BY-SA）等都是向资本主义版权作斗争的运动。其主旨是在软件或文字作品领域逐步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版权，并转变为公有而自由的。顺带一提，如果您希望您的文字作品自由的发布，建议您在您的文字作品中加上一句：

“本内容依据“CC BY-SA 4.0”许可证进行授权。要查看该许可证，可访问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想要回到那个小生产广布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是不现实的，是反动的，其显然不适合于生产逐渐社会化的历史潮流。在知识领域也是如此。因此，知识行业无产阶级应该是和工业无产阶级的目标一致，即：实现真正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

慕华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建国三十年经济数据

慕华

*的项的 1949 年数据为 1952 年数据（此处增长率计算没有错误）
数据来自《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摘要》
价格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1949	1957	1965	1978
全国人口数	万人	54167	64653	72538	95809
原煤	亿吨	0.32	1.31	2.32	6.18
发电量	亿度	43	193	676	2566
原油	万吨	12	146	1131	10405
钢	万吨	15.8	535	1233	10405
化肥	万吨	0.6	15.1	172.6	869.3
棉布	亿米	18.9	50.5	62.8	110.3
粮食	万吨	11320	19505	19450	30475
棉花	万吨	44.5	164	209.8	216.7
油料	万吨	232.8	377.1	327.2	456.8
猪年末	万头	5775	14590	16693	30129
全民所有制职工	万人	800	2451	3738	7451
工农业总产值	亿元	466	1241	2235	5631
农业总产值	亿元	326	537	833	1567
工业总产值	亿元	140	704	1402	4064
轻工业产值	亿元	103	387	723	1752
重工业产值	亿元	37	317	679	2313
基本建设投资	亿元	11.34	138.29	170.89	479.55
进口总额		21.3	50	55.3	187.4
出口总额		20.2	54.5	63.1	167.6
化肥施用量*	万吨	29.5	179.4	881.2	4368.1
农村用电量*	亿度	0.5	1.4	37.5	253.1
机耕面积*	万公顷	13.6	263.6	1557.9	4067
水泥	万吨	66	2787	1634	6524
粮食零售平均价*	万斤	989	1100	1187	1474
食用油零售平均价*	万斤	4300	5656	8199	8233
牛肉零售平均价*	百斤	41.5	50	58	59.6
猪肉零售平均价*	百斤	46	59	81.2	81.2
棉布零售平均价*	米	1.03	1.1	1.5	1.6

1957 增长率	1965 增长率	1978 增长率	前三十年增长率
0.0223668	0.01448846	0.0216342	0.01986
0.1926559	0.0740564	0.0782782	0.107489
0.2064549	0.16963047	0.1080575	0.151421
0.3666158	0.29163177	0.1861425	0.262736
0.5531453	0.11000814	0.1782901	0.250814
0.4965913	0.35599466	0.1324262	0.285289
0.1307164	0.02762233	0.0442791	0.062717
0.0703787	-0.0003529	0.0351466	0.034739
0.1770922	0.03126482	0.0024923	0.056104
0.0621459	-0.0175859	0.0259995	0.023516
0.1228272	0.01697409	0.0464704	0.058617
0.150222	0.05417327	0.0544943	0.079986
0.1302467	0.07631209	0.0736676	0.089726
0.0643748	0.05641325	0.0498072	0.055631
0.2237158	0.08992577	0.0853112	0.123162
0.1799381	0.08125572	0.0704562	0.10265
0.3079983	0.09989522	0.0988707	0.153268
0.3670116	0.02681152	0.0826063	0.137828
0.1125609	0.01267337	0.0984307	0.077867
0.1320892	0.01848376	0.0780383	0.07569
0.4348288	0.22013113	0.1310409	0.188075
0.2286597	0.5083006	0.1582153	0.239517
0.809178	0.24867458	0.0766053	0.217223
0.596611	-0.0645633	0.1123742	0.171634
0.0215021	0.00956028	0.0167973	0.013855
0.0563509	0.0475058	0.0003184	0.02265
0.037969	0.01872567	0.0020955	0.01256
0.051039	0.04072983	0	0.019789
0.0132371	0.0395307	0.0049768	0.015304

慕华
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

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吗?

—— 驳唯生产力论的鼓吹者的一个“新论点

原载《人民日报》1976 年 2 月 26 日 复旦大学大批判组

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一个理论根据。所谓“生产力首先是科学”，就是他们宣扬唯生产力论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新论点”。宣扬这个论点，就是篡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鼓吹“科学技术决定一切”，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其实，所谓“新论点”，也并不新鲜。西方资产阶级，老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不少人早就鼓吹过类似的东西。不过，在我国，它毕竟是新近提出来的，而且采用了一个“新手法”，就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来骗人。因此，还有必要加以揭露和批判。

（一）

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无非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首要的因素是人，是具有一定劳动经验和技能的劳动者。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九七页）* 列宁也说过：“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二七页）*

诚然，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科学技术的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技术的进步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标志。但是，离开了人的劳动，任何科学技术都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硬把科学技术说成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而且把这个论点强加在马克思的头上，振振有词地宣称：“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句话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过的。据他们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过，‘所谓社会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社会的力量，最后才是……’。”

果真如此吗？查一查，不对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作了这样一段论述：“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家靠什么办法来增殖资本，扩充生产力呢？ 当然谈不上去调动受他剥削的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只能主要地依靠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怎么能把资本家增殖资本的具体办法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混为一谈呢？这就暴露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恰恰是想把资本家的办法搬到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来。

还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是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的社会生产力。所谓固定资本，就是资本家占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等生产资料，马克思又称作"死的生产力"或"已生产出来的生产力"。这当然就不包括人的因素，不包括活的生产力。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把"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句话一刀砍去，造成一种似乎马克思是在给整个生产力下定义的假象，似乎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劳动者的力量同科学技术相比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明目张胆的歪曲吗？

刮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你们诬蔑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抓住一句就和马列主义对着干"，实际上这样干的不正是你们自己吗？

（二）

"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奇谈怪论，是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

按照这种奇谈怪论的逻辑，既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科学研究就成了最重要的生产。于是，科研为政治、为生产服务的问题就可以不提了，开门搞科研成了多此一举，远离生产的玄而又玄的研究就有理由放在突出的地位，修正主义科研路线也由此找到了"理论"依据。

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自然科学是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总结，虽然它不是上层建筑，但它是要人去搞的。科学研究机构，则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个科研机构，都有一个是否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否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否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问题。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从实践中抽象出理论，在实践中检验、发展理论，并用理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过程。把这种过程与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划上等号，就必然否定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必要，也就是把人类认识活动的实践基础兜底抽掉，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根本上堵塞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实践是科学研究的唯一源泉。"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二三页）* 先有生产，先有生产的迫切需要，然后才有自然科学的研究，历来如此。在古代，由于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定季节的需要，才产生了天文学；由于丈量土地、测量容积、计算时间的需要，才产生了数学；由于农业的提水灌溉，特别是城市建筑、航海和战争的需要，才有了力学。到了现代，如果不是工业的发展带来了 X 射线和天然放射性的发现，人类认识就不可能深入核物理学领域。至于半导体、激光、仿生学等等，也无不是生产实践推动下的产物。

科学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五十五页)* “以前人们夸说的只是生产应归功于科学的那些事；但科学应归功于生产的事却多得无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五二四页)*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对革命导师的这些重要论点只字不提，却大谈起科学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足见他们对生产实践轻视到何种地步。怪不得他们把 CR 后科研战线的大好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把开门搞科研说成是“科研不抓”、“理论不提”，吵吵嚷嚷地要为“理论”“正名”了。他们要的那种“理论”我们见过，无非是关在“象牙之塔”里苦思冥想的“理论”，是“几百年以后别的星球上才有用”的“理论”。他们要的那种科研我们也见过，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等学校和许多科研机构就是这么干的，除了耗费国家的大量资金，给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设置重重障碍之外，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的今天，有人要把科学研究拉回到邪路上去，教育界、科技界的广大革命同志是决不答应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鼓吹“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把科研与生产等同起来，还引伸出一个所谓科学院也是“工厂”的结论。列宁在谈到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建设自己国家的时候，曾讲过可以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些组织形式，如银行、良好的工厂、科学院等等。他们却由此歪曲为科学院被列宁当作“良好的工厂”。既然科学院是“良好的工厂”，科研机构就成了生产单位，那么科学研究还有什么必要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相结合呢？科学院是工厂，那么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就成了工厂的“工人”，什么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岂不可以不要了吗？这样做，势必使科学研究阵地重新变为孳生修正主义精神贵族的肥沃土壤。这样的科学技术现代化就决不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只能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三)

对于生产力中什么是首要因素的不同回答，关系着是否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必然重视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重视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工人、贫下中农批判了刘少奇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社会主义积极性极大地焕发出来，带来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事实雄辩地说明：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有些方面还很不完善，其中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仍然存在着企图恢复旧的生产关系的反动势力，党内走资派就是他们的代表；此外还存在着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的残余，也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的。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中不完善的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改变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那一部分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特别是注意对党内的走资派进行斗争，社会主义生产力才能不断发展。

按照“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论点，必然把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看成首先要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谓“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前头”的谬论，就是由这个论点引伸出来的。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并不是在讲我国科学技术要有高水平，应当走在世界的前列。他们是在讲，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抓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可以决定一切，其他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一来，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无产阶级政治，什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党的基本路线，岂不是统统都要一笔勾销了吗？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要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列宁曾明确指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页）*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下去，国民经济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如果不是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出现今天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吗？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如果不解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生产的物质财富即使再多，也不能始终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弄得不好还会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又怎么谈得上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

在现今西方的世界上，资产阶级为了挽救他们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制度，极力鼓吹“技术救世主义”。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家宣扬“实验室是将来的后庙，是一切财富之源，也是人类幸福之源。”苏修御用文人也拚命鼓吹什么“社会力量的最好的源泉在于科学”，“现在决定人类命运的”正是“掌握我们时代最高度发展的技术的人”。他们兜售这种“技术救世主义”，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我国教育界和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重弹资产阶级的老调，究竟反映了什么阶级的意志和愿望，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我们同右倾番羽安木风的鼓吹者的论战，是一场要不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原则争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一场伟大的斗争。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毛主席就庄严宣告："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二十多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真理。我们坚信革命可以改变一切，搞现代化，发展科学技术，靠的是正确路线。只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就一定可以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请看苏修的新玩意

《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注：似乎还没有各级党校，看来预言不能百分之百准确)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备注(本来想在文件属性里面写的，发现转换 PDF 文档属性没了，就这样吧)：

编辑部邮箱：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
编辑部 PGP 公钥指纹: A8FD17B443EEC7949FCC8782E3580133477209C1
编辑部 PGP 公钥(对于 PGP 加密法之后会出一篇介绍文,可以康康):

-----BEGIN PGP PUBLIC KEY BLOCK-----
Comment: 用户编号: 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
<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
Comment: 连接时间: 2020/2/5 15:39
Comment: 文件系统: 2048 位 RSA(绝密密钥可用)
Comment: 用途: 签名, 仅加密, 正在认证的用户编号
Comment: 指纹: A8FD17B443EEC7949FCC8782E3580133477209C1

mQENBF46cSQBCADLDqE35cA6i/2IY9HfLB0uFkpp8sDtgjLrotpDqEFT0rJAjhyJ
pAtey/+3BJHyVL+xiPD/KgOmRCPfXaMwKY7i5q2l+EkZxfrg6NrneKjot9Vn6O6p
CM2p04x5/xGP2fCNUTtSSbHJXiw9Y3ZjX0wul8+kVQ6utyy13GoqvwxFmgcP0UcX
FIes2owW/gu/pIw1STwjO6rQgZJDwItSFD2FPWulg2pvNjvIjBqhjL4H3TPcIHzH
GNLgSM1cAS92likCyU3YILp00YZB8SSEiRtoaHK39SaGNinSuEMEPGulDvvxsUnD
UN5rDWFQRLGvMt9BgrFUtE32rXKP1tARl4SBABEBAAG0OXVzbm5ycWZmamNxdkBw
cm90b25tYWlsLmNvbSA8dXNubnJxZmZqY3F2QHByb3Rvbm1haWwuY29tPokBNgQQ
AQgAIAUCXjpxJAYLCQcIAwIEFQgKAgQWAgEAAhkBAhsDAh4BAAoJEONYATNHcgnB
L7kH/RVMGZ8EougELx1yYeuxECEhApu4PJoVHX77SbjQTJ8noEQmLy6SfwOs4pjF
go4sJco0xiYBL304/B5/tpo4LC6aabGBV2afXdI41nqKVl1JJw/OtedTUzx6deGH
AA8gmeZLHJbAbALVAi1ffkO3NXK8sWRo1r9A9Hits8STO56Jz/jImGfuox5eX/qE
+f0l7tSHeeVRdGGO6uxUURnN/5feXDBXYBTHnq79sCyvxxJNEbvTRVCvPFC3emTk
3lsEVoNp7MFHJeUgTeMPUF5xKAkiiUiaBKcS9PPWGEJXL83jYpnJKpfVO4pklYJH
ccrjQ0RoBpToCbUmQZrq60f9tQW5AQ0EXjpxJAEIAKkxA99SQ1mcXSK80761iRzT
KpM0eOnr6xWwNMnsuU/fsmRPVBjtD+u3SUvtbaKsfTs6g1pY4lmZqLu4cSmH70EO
C75BCSDQzADL/kP3c3C6RWELGlry9imwTGZp3vLv11iF3MkjtCx8gVOww1UWfwXw
Xyo6Lm1U/5doXimOEuL/1okPSITvo1PpqHui2HhxWlXQCVaZknezlJIW1sdQS37x
GcJpCLcxGdRtMmDuTr7i/MIiumbGoR3iYfxckKX6bhBtkXeUyLS1rMycdieJUzkL
H+OXg77uy85kQSHpz31EWOScMB8VlGWGKZb4nY7Q7lj32ygURWjvczcByPGyqPkA
EQEAAYkBHwQYAQgACQUCXjpxJAIbDAAKCRDjWAEzR3IJwcENCACvv6PgPsmmCUQh
t7tzqKHj5VUx6P6Lfan4I4W4t2sZdbGda3isRpBIr2fS6/Pdp5ADjrfgy/KoQWuL
9jQstwxO60Hnoz1l7oGkhor2ce+pNBWTXXqww4EVWs7GnzCXjjsYcBIkSsU4dgPh
xXH2Iov99Tthn6cLEschU6OClE4oAl8GRzjjA9WVLwZGBw1iVbHyoL2WDnn5eVBv
PYa0FqROffZayzZ5UDK6G8c2BjkaO14Pv1tdXw18eQpiySPDzpyYzedvf1I46PU/
8x28iJPx9Wc1/7WSOwxb1x/aF7ArDDNP+z9nCupf8cgKJkJa1Odg42La9cujXXhE
/nzrbeQx
=3pTu
-----END PGP PUBLIC KEY BLOCK-----

muHua-usnnrqffjcqv